

资讯信息 仅供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 11

第2卷第11期

总第22期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目录

高教动态	1
“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变迁”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1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建院 47 周年学术周开幕	3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战略教育人才的造就与培养”研讨会举行	4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加入亚太高等教育研究联盟 共筑亚太高等教育研究新格局	4
复旦大学设立新文科发展基金	5
辽宁师范大学成立人文高等研究院	6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生“下水”养师德	6
南开大学颁发全国首批人工智能专业技术等级证书	7
高教研究	8
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 夏立新	8
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 杨宗凯	11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学何为 邱勇	16
携手共创欧洲未来：欧洲大学联盟的经验 欧洲大学联盟	17
欧洲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潜在的十字路口 [西]塞巴斯蒂安·布鲁克	19
质量标签还是新学位？欧洲学位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瑞士]玛丽亚·凯洛	20
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关键问题的制度理性视角 眭依凡 李芳莹	22
新文科 2.0 建设的理念、思路与重点举措 张斌	33
他山之石	41
美国高等教育衰退，中国该怎么办？ 张端鸿 刘虹	41
日韩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的动向分析 梁荣华 孙洁琦	42
美国一流大学应对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改革行动与反思 邢园园 钱玲	50
数字化赋能高校虚拟教研建设：国际启示与本土策略 胡小勇 许课雪 刘雪旋 等	65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学发展的理念与实践探析 李辉 刘苗苗	66



高教动态

“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变迁”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5月12日,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顺利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陈平原,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朱水涌教授,苏州大学周川教授,以及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近百余名师生参加会议。

上午,陈平原教授作了题为《现代中国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的学术报告。报告由邬大光教授主持。

陈平原教授从历史发展视角选取了中国大学的六大关键时刻,分别是1905年科举废除、1919年“五四运动”、1937年大学内迁、1952年院系调整、1977年高考恢复,以及1998年开启的大学扩招与争创一流行动。陈教授认为,科举的功绩在于取士,但在人才培养、新式学校推广和社会变革等方面却产生重大阻碍;“五四运动”不仅具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意义,在教育史上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确立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大学精神”;“大学内迁”让中国大学及读书人在战火纷飞中顽强生存、抗争、发展,蕴藏着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院系调整”让大学从“以文理为中心”转向以“应用学科为主”的同时,优化了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加强了对高等教育落后地区的支持;“恢复高考”为“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契机,但应试教育理念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仍值得反思;争创“世界一流”与推动“大学扩张”的内在张力激发我们深思,在二者不同步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协调发展。最后,陈教授基于对百年中国大学发展历程的系统分析,认为大学发展应扎根中国大地,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七个关键时刻已然来临,面对中国大学发展的下一个关键阶段,应调整方向,补足短板,构建良好的发展生态。

在圆桌论坛环节,陈平原教授、邬大光教授、朱水涌教授和周川教授围绕中国大学发展历程与未来方向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与思想碰撞。论坛中,嘉宾们围绕“长在”中国的大学和“办在”中国的大学展开了热烈讨论。

朱水涌教授强调,中国现代大学蕴含着深厚的“中国基因”,这些基因贯穿于大学的发展脉络之中,生动展现着独特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大学区别于世界其他大学的重要标识。周川教授指出,中国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既离不开特定历史、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根植于自身的文化基因与学术传统。陈平原教授将目光聚焦于当下的变革,特别提及人工

智能对人文学科带来的冲击。他指出，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浪潮下，注重人的教育和保持身心健康将成为未来大部分大学的发展重心。最后，邬大光教授作总结。他认为，在未来的大学发展与高等教育研究中，人工智能与大学教育的有机融合将成为关键，如何更好地促进二者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技术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与探索。

下午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邬大光教授与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周川教授作主题报告。研讨会由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赵婷婷教授主持。

邬教授围绕“从中国近代大学之源看扎根中国大地办学”作主题报告。他提出在教育强国建设中，高等教育研究离不开历史研究。

邬教授认为，中国近代大学的源头包括中国本土举办、外国势力举办、中外混合举办等多种形式。中国近代大学学习西方经历了本土化和去本土化、日本化和去日本化、欧美化和去欧美化、苏联化和去苏联化、美国化和去美国化五个阶段，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都对我国高等教育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邬教授指出，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我们要重思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时代逻辑、西方逻辑与中国逻辑、教育逻辑与国家逻辑、体系逻辑与治理逻辑。最后，邬教授提出我们应重新认识高等教育三大职能及其逻辑关系，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随后，周川教授以《胡适的教育家精神》为题，深入剖析了胡适作为教育家所展现出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

周教授认为，胡适的教育家精神切实体现在教育实践的点滴之中。在“育人智慧”方面，他因口才出众、内容新颖、见解独特而备受赞誉。胡适本人也坦言，“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讲课是他挚爱的职业。周教授认为，胡适作为杰出的教育家，“育人智慧”的背后是个人、教学与待人方面有着深厚的根基，“仁爱之心”和“有教无类”体现得淋漓尽致，“躬耕态度”令人钦佩，“磁性人格”难能可贵。周教授强调，“教育家精神”绝非称号，而是一种品德与人格特质，体现在具体行动中。胡适的“教育家精神”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建设教育强国之路上不断前行。

在场师生表示，几位报告人通过对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变迁历史的扎实研究和生动诠释，让大家对中国大学发展历程与未来方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意识到要打开学习与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形成从国际环境、国家发展环境理解高等教育发展的全局思维。

（来源：厦大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建院47周年学术周开幕

5月12日上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建院47周年学术周开幕式在厦大科艺中心1号会议室隆重举行。厦门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特聘教授邬大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党委副书记姚有新,副院长赵婷婷、覃红霞、王树涛,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鲍威、副主任吴薇、徐岚,以及全院师生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教育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振天主持。

别敦荣院长首先作开幕致辞。他回顾了厦大教育研究院从研究室到研究所再到研究院的建院历史,以及从建立新学科到建成重点学科再到建设“双一流”学科的发展变化,强调教育研究院在潘懋元先生的带领下,经过47年的锤炼,已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研究重镇、人才培养摇篮和高端智库。他指出,以学术的方式为研究院庆生是厦大教育研究院的重要传统,但学术周的举办不仅在于为研究院庆生,更是借此契机,回溯学术初心,传承潘先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谈及未来,别敦荣表示,面对建设教育强国的伟大使命,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应主动对接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需求,优化学科发展方向,推动学科范式转型,为构建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厦大智慧。

随后,厦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朱水涌教授以及院领导为获得2025年厦门大学奖教学金的师生颁发荣誉证书,现场气氛热烈。刘振天书记表示,希望获奖师生的出色表现能激励全体师生持续奋斗进取、深耕不辍、追求卓越。他勉励高等教育研究者要胸怀“国之大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更高站位、更广阔视野投身高等教育研究,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开幕式结束后,为期一周的院庆学术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学术周亮点纷呈,将为全院师生以及与会者带来一场学术盛宴。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学术周有两大亮点:第一个亮点是学术周第一天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学术变迁”学术研讨会,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陈平原,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邬大光教授,杰出校友代表、苏州大学周川教授作报告;第二个亮点是在学术周最后两天举行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委员会2025年学术年会,年会主题是“研究型大学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创新发展”。期望全院师生能够通过院庆学术周深入交流研讨,激发创新火花,以饱满的热情和实际行动向教育研究院的生日献礼!

(来源:厦大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战略教育人才的造就与培养”研讨会举行

5月13日上午，“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战略教育人才的造就与培养”研讨会暨研究生教育教材发布仪式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多名来自高校、教育期刊及基础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活动。他们围绕“战略教育人才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意义和作用”“战略教育人才的培养模式”等主题，展开深度研讨。

山西大学教授侯怀银在专题报告中，梳理了教育博士学位的历史沿革与培养体系。他表示，教育博士培养推动了教育学范式向实证创新转型，拓展了教育研究的实践维度。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马凤岐就“教育学学位论文的几个标准”作了阐述，对学术论文和期刊论文进行比较和分析。深圳大学教授李均系统阐述了教育强国背景下的战略教育人才培养。《高教探索》期刊社主编刘第红阐释了战略教育人才培养的“鲲鹏六力”理论框架。

本次研讨会还邀请了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肖冰、广州市教育局师资工作处副处长陈秋兰等多位教育博士优秀毕业生代表，进行分享。

在研究生教材发布会上，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中就《高等教育概论》的写作背景和主要特色作了说明。卢晓中表示，《高等教育概论》被列入“全国高等学校重点规划系列教材”。此次第三版教材以“学科与问题双向融合”为理念，融入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涌现的数字化战略等现实问题。

据介绍，华南师范大学历经十五年探索与实践，构建并形成特色化的“工作场—自述型案例”等三维协同机制。学校还创新“认知性实践—综合性实践—创新性实践”梯级递进能力培养路径，系统化破解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问题，并提出改革举措。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加入亚太高等教育研究联盟 共筑亚太高等教育研究新格局

4月28日至5月1日，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雯教授代表我院参加香港高等教育研究年会（CHER-Hong Kong Conference），与会期间，我院正式加入亚太高等教育研究联盟（Asia-Pacific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Partnership, APHERP），成为这一国际性高等教育研究合作平台的新成员。

与会期间,文雯教授应邀参与“探讨地缘政治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在大中华地区探寻富有成效的大学间合作模式”圆桌研讨会。她提出,越是在地缘政治挑战加剧之际,大学越要发挥其能动性,并在国际交流合作中重视伙伴关系(partnership)和联结(connectivity)。伙伴关系是基于共同价值理念的深度协作,通过常态化的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建立互信互促关系;联结性则强调构建跨国界、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网络,打破地域与学科壁垒,为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性的支撑。

亚太高等教育研究联盟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覆盖全球的高等教育研究合作平台。联盟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通过跨国协作开展高等教育政策、治理与实践的前沿研究,推动区域及全球高等教育创新发展。联盟通过组织联合研究、学术会议与人才培养,持续为成员提供跨区域资源整合与成果转化支持。清华大学教育学院的加入,是学院响应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和清华大学全球战略、践行全球学术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此举将进一步拓展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在全球高等教育研究网络中的影响力。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复旦大学设立新文科发展基金

在纪念建校120周年之际,复旦大学设立新文科发展基金,助力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创新。基金首期筹措资金1亿元,由1984级新闻系两位校友曹国伟、王长田联合捐赠。基金将实行开放管理,汇聚更多社会资源,为复旦新文科的发展集聚动力。

“我们对复旦感情深厚,希望通过行动为母校学科建设和发展出一份力。”大学毕业后,曹国伟、王长田深耕业界,目前分别担任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今天设立基金支持新文科发展,恰逢其时。”经过与学校的多次深入研讨,曹国伟、王长田希望为母校建校百廿送上一份“有意义的礼物”。

近年来,复旦对接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以新工科、新文科等为代表,推动学科交叉与融合创新,加快向创新型大学转型升级。前不久,复旦新工科六大创新学院纷纷亮相。与此同时,学校新文科建设也迈出新步伐。新文科的“新”字意义深远——发展新文科,不仅要提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能力,还要提高回应国家、社会和时代关切的能力,提高学术范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能力,引领复旦学人更好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据悉，新文科发展基金将发挥“催化剂”功能，助力推动新文科创新发展。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辽宁师范大学成立人文高等研究院

5月11日，辽宁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下称“高研院”）宣布成立，辽宁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宏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共同为高研院揭牌。

据介绍，高研院将依托学术深耕与产业联动，致力建构传统人文精神与现代学术范式对话的桥梁，推动文史哲艺交叉学科创新研究，打造高水平人文社科研究平台，通过深化校地合作、拓展国际对话、培育青年人才，为传承中华文脉、服务国家文化战略作出积极贡献，逐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品牌。

针对未来发展，刘宏提出，强化内部研究体制顶层设计，推动高水平成果产出；创新人文学科发展机制，以高研院为枢纽，辐射带动全校学科生态升级；立足现实关切，探索文学与教育、社会的深度联结，将“全民阅读”构想转化为学术实践。

辽宁师范大学校长罗文波表示，高研院将立足辽宁本土文化资源，积极发挥辐射全国的学术影响力，在深耕传统文脉的同时，大力探索数字人文等前沿领域，为新时代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和理论保障。

当天，与会专家还围绕“AI与当代人文学科发展的走向”展开圆桌讨论，凝聚了三项共识：推动学术研究“回归现实关切”，培育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通过数字人文方法重构传统文脉，但需防止技术异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评价体系，使“中国学派”从理念走向实践。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生“下水”养师德

“这门课让我明白，教育者的温度藏在细节里，比如处理学生冲突，批评错误的同时要守护他们的尊严。”最近，浙江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郑慧娴在《师德养成》线上课程的话题讨论区写下感悟。

近年来，随着基础教育教师学历层次要求的不断提升，师范院校教育硕士研究生占比显著增加。“培养具有‘德育自觉’的未来教师，必须打通‘认知-践行-反思’全链条。”浙江

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温建明坦言，传统培养模式容易导致德育缺乏实效，“就像教游泳只在课堂讲动作要领，却不让学生下水”。

对此，该校将“德育自觉”具化为可量化、可追踪的培养标准。在为期1个月的见习环节，实习生观摩并记录主题班会不少于1次，师生交往案例不少于3个；在为期1学期的实习环节，要求实施个别教育案例不少于1个，独立组织2次主题班会，提交1篇德育实践反思报告。专业导师同时明确，研究生们要全过程记录所见所闻的教育细节，运用相关教育学、心理学原理，解释所见所闻，从中概括、提炼相关问题解决的一般道理，并付诸实践。

如此大体量的“下水”学习，让“准教师”们对师德有了直观的理解。张靖雯来到义乌市青岩书院见习第一周，发现该校某班主任正在总结班级情况，原以为会批评寝室整理被扣分的学生。没想到，班主任表扬了寝室未被扣分的学生，并宣布以后每周在班级内评比模范寝室。“巧妙地将批评说教转化成了引导激励，以此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张靖雯将这个情境记录在见习本上。

下一年，张靖雯开始教育实习，班上有一名爱打瞌睡的学生让人头疼。张靖雯因势利导，挖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让他任班级体育委员，同时在课上多次让他发言。

“这些案例在成熟教师身上并不新鲜，但对于刚走出大学的教育硕士，却是难能可贵的。”浙师大田家炳德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查颖介绍说，学校还聘请了陈立群、俞正强等一大批师德模范实践导师，师生比例严格控制在1:3以内，确保指导的高质量和精准度。

据悉，这套师德培养体系历经了26年沉淀，为中小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些研究生们还赴广西、新疆、四川等地开展义务支教活动，对口广西龙州县的支教活动连续开展25年，当地直接受益师生6万余人。

“‘德育自觉’不是抽象概念，而要转化为可观测、可评价的素养指标。”浙江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蒋云良表示，学校正构建“德育能力数字画像”，通过分析浙师智慧教师教育平台上数十万条实习跟踪数据，形成涵盖共情力、规则内化度等维度的评估模型。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南开大学颁发全国首批人工智能专业技术等级证书

近日，全国首批35张人工智能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在南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正式颁发，标志着南开大学在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方面迈入新阶段。

此次颁发的证书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指导认证，培训与考核全程接受天津市人社局

的监督与指导，与天津市“十项行动”及数字经济人才培育政策紧密衔接。根据《天津市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育项目实施方案》，取得该证书的学员可直接认定为助理工程师职称，打通“技能认证”与“职称晋升”的双向通道，为数字技术人才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南开大学 2024 届本科生李欣获得了 001 号证书，她表示：“证书不仅是对专业能力的官方认可，更让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职业规划有了明确方向，未来我将继续深耕技术，助力行业创新。”

南开大学作为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充分发挥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学科优势，构建了“理论奠基+强化实操+自主练习”一体化培育体系，培训课程紧扣国家标准，计算机学院优秀师资领衔授课，利用理论和实操教学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确保学员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平台设计与应用等核心技能上获得全面提升。

来自天津商业大学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学员甘洪福感慨：“系统性培训让我在数据分析和 AI 模型构建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证书标志着我具备了从事人工智能工作的基本技能和职业素养，增强了我在求职时的专业认可度和市场竞争力。”

天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南开大学此次颁发全国首证，是天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成果。未来，南开大学将持续深化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计划每年培养千名人工智能、大数据、密码工程、数据安全等职业领域专业人才，为京津冀乃至全国输送高水平数字技术人才，助力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高教研究

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 | 夏立新

阅读提示：在 2025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华中师范大学承办“智能时代教师角色转变与能力提升”平行会议之际，5 月 14 日，新华网刊发了对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夏立新的专访“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以下是专访全文。

从“互联网+”到“智能+”再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正推动千行百业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转型，给教育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华中师范大学提前布局教育

信息化，2024年启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计划”，把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的全面战略和优先战略，取得积极成效。面向未来，学校如何发挥教育数字化先发优势，在推动人工智能在人才培养和教师教育上展现新作为？记者日前专访了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夏立新。

人工智能重构高等教育格局

记者：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夏立新：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涉及教学理念、管理模式、教师发展等多维度的深层变革。首先，人工智能将重塑教育新形态。对学生而言，人工智能提供了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差异化、优质化、精细化的学习空间、教育资源。对教师而言，人工智能为课程内容生成、教学方法创新、教育评价反馈等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与模式。

其次，人工智能将构建大学新样态。高校的“围墙”将被“人工智能+高等教育”打破，育人空间、育人资源跨校、跨界，形成全新的育人组织形式和生态，高校管理将更加精细、决策更加科学、服务更加人性。

最后，人工智能还将打造育人新生态。人工智能影响着高等教育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正从工业化向智能化发展，从标准式向创新式发展，从被动式接受到内生性变革，为教育现代化带来更多可能性。

华中师范大学理科综合楼记者：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夏立新：挑战在于人工智能如何合理、有序、安全地融入高等教育生态。为更好应对挑战，高校师生的智能素养需要提升。目前我国还未制定师生数字素养标准，部分教师的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化教学创新与应用能力不够，对人工智能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场景与模式不熟悉。特别是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部分师生存在技术依赖风险。

此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亟待变革。高校现有人才培养模式与人工智能时代对专业人才的新需求、新要求不匹配，人工智能课程和教材体系还需完善，人工智能学习工具和学习环境建设还不够，专业培养也有待优化、调整、升级。与此同时，高校数据治理体制机制需要深度改革，数据治理、数据安全、道德伦理等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培养适应数智时代的新质人才

记者：学校在推进“人工智能+教育”上有哪些探索？

夏立新：我们始终将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构建一流大学创新体系的重要引擎，作为赋能大学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赋能教育教学方面，助力个性化学习，学校自主研发“小雅”智能教学平台，打造“AI+智能助教”“AI+备课助手”“AI+智慧考试”“AI+数字教师”等全场景、开放式互联智能学习空间，探索智能知识图谱等 AI 赋能教学场景，构建集成化、智能化、特色化的助教应用服务。

在赋能科学研究方面，强化集成式创新。学校搭建起“人工智能+教育”集成攻关大平台，建成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积极培育国家数字化学习技术创新中心，研发智能云端一体化学习等多项关键技术。此外，积极推进“AI+科研”平台建设，实施“AI+X”交叉研究创新工程，持续支持“AI+教育”做大做强。

在深度应用方面，赋能内部治理。实施校务数字化智能升级行动，推进“教师一张表”“学生一张表”“资产一张表”，建设“数字驾驶舱”，构建更加智能的数据服务平台，推动实现信息高度集成、决策更加科学、管理更加精细。

记者：学校依托人工智能创新人才培养有哪些尝试？

夏立新：人才培养是高校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校正积极构建“两并重三协同四融合”数据驱动的智慧教育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从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维度，实施“A1+人才培养”提质赋能行动，整合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育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编制学科专业知识图谱、能力图谱，构建理论与实践并重、教学与科研并重，“师-生-机”协同，多空间融合、多模式融合、全过程融合、产学研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从支持个性化学习维度，建设 400 余间智慧教室，打造“AI 学伴”“智慧教室”“知识图谱”等应用场景。自主研发云端一体化智能教学平台“小雅”平台，支撑全校 6587 门课程开展融合教学，开设 6.5 万个线上课程空间，全面提升教学数据化、评价实况化、交流立体化、资源共享化水平。

助力教师教育改革创新

记者：对师范院校而言，推行教育数字化要抓住哪些关键要素？

夏立新：目前，我国有200多所师范院校、近600所非师范院校参与教师培养。首先，作为教师教育的关键主体，师范院校要主动对接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对教师队伍的新要求，培养能够高效使用和驾驭人工智能的创新人才和卓越教师。其次，师范院校要发挥衔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大中小学联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使命任务，把握创新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动人机交互的“师-生”教学模式升级为人智协同的“师-生-智”教学模式。最后，师范院校要注重扩大优质教育信息覆盖率，改善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条件，缩小城乡、区域和校际的教育差距，形成教育数字化发展的良好生态。

记者：从学校实践看，如何借人工智能推动教师队伍建设？

夏立新：学校深度谋划AI赋能高等教育的场景、范式、工具，打造教师教育评价大模型，创新数字化卓越教师培养模式。从赋能卓越教师培养角度，学校自主研发智能化环境建设与平台工具，建设“AI+教师教育”综合实验实训平台，创新“AI+教师教育”应用场景，加强师范生数字素养测评与培训，不断提升师范生的数字化生存与适应能力、教育教学研究能力、教师专业发展终身学习能力、教育教学创新实践能力。

在赋能教师成长发展方面，学校通过研发教师发展智能平台，开展教师素养刻画与课程资源建设评估，构建教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形成数据驱动的教师精准研修模式，面向全校教师开展信息技术与教师培训融合创新，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与技能。

在赋能教育均衡发展领域，学校加强与宁夏、青海、云南等地在数字教育方面的合作，助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助力地方师范大学开展智慧校园建设，将优秀在线教育资源引入西部地区，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提供服务保障。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号）

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 | 杨宗凯

阅读提示：高等教育数字化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改革所向。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科技创新策源地、社会服务新高地，如何进一步释放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

发展新优势的强大动能,探索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创新性教学的有效途径是国内高校面临的共同课题。

武汉理工大学抢抓机遇,将教育数字化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持续推动学校管理体制、育人方式、评价体系和服务保障系统变革,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着力塑造发展新优势,近年来取得积极成效。

2025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召开前夕,《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杨宗凯,探讨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

◆ 武汉理工大学打造知识和数据双驱动的理工智课平台,深度对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共建校企微课程 150 余门,开发汇聚优质资源 60 万余条

◆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远程接入“无人工厂”“无人码头”“无人汽车”等尖端技术与实际应用场景,构建“沉浸式”教学环境

延伸大学的智慧边界

《瞭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对学校治理体系引发哪些结构性挑战?

杨宗凯: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场系统性变革,是教育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和全领域的数字化转型。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高等教育进入一个需要全面创新的时代。

在办学模式方面,教育资源的供给模式经历了显著变革,亟需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共享、个性化,并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育体系。未来的大学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有形围墙之内,而是通过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一步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与联系,拓展其边界。

武汉理工大学打造知识和数据双驱动的理工智课平台,深度对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共建校企微课程 150 余门,开发汇聚优质资源 60 万余条。同时,加快校地、校企、校校融合发展,实现与襄阳示范区、三亚科教园等异地研究院的互联互通和数字孪生,与行业头部企业联合打造“无边界”课堂,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实现教师共享、课程互选、学分互认,促进空间数据集成,实现优质资源共享。

在管理体制方面,现行高校管理倾向于采用科层制,数字时代需要的是更为扁平化、精准化和灵活的管理方式。武汉理工大学经过三年的努力,已经将学校内部140多个信息系统打通,构建了大数据中心和学校智能运行中心(IOC),并且融入数理分析模型。校长和院长无需经过逐级汇报,便能全面、直接地掌握每个学院、每个项目等的情况。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他们能够及时了解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并通过数据驾驶舱以红、黄、绿三种颜色进行实时预警。校长办公会已经实现“系统汇报、数据说话”的高效运作模式。

在保障机制方面,学校以更加智慧化的保障机制为依托,比如夯实学校数字基建,包括云网数端、智慧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加强教育教学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校园数字文化建设,为师生提供全场景、移动化、智能化的学习工作保障。

规模化个性教育成为可能

《瞭望》:学校推进数字化转型聚焦哪些核心领域?

杨宗凯: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支撑教育改革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举措。武汉理工大学从“党建引领、数据驱动、协同共享、提质增效”切入,推动数字化转型,促进教育现代化,塑造学校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其中,数据驱动是关键。数字时代的大学治理要有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基础是数据的整合与应用。在管理方面,学校提出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数字化的策略,充分利用教学科研、管理运行等活动中产生的数据,汇聚106个关键指标形成综合校情“十大指数”建设“校长驾驶舱”,选取核心业务领域的关键指标项建设“处长驾驶舱”,梳理2700余个数据项建设“院长驾驶舱”,以数据赋能学校治理方式变革。从教学角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在规模化教学中实现个性化教育提供了可能,甚至能够实现一人一策,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课程表。

协同共享也是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高校应运用数字化技术,打破校内各学院之间乃至学校与外部企业、其他高校之间的物理界限,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范围。

武汉理工大学通过拓展物理空间、数字空间、社交空间,有力促进教育教学变革。比如将225间教室建成常态化课堂直录播系统,开设数字化课程1300余门,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建优质课程126门。与相关高校合力打造校内、校外“双空间”育人场域,与相关行业企业联合打造“无边界”课堂、定制班,推动新技术新应用战略合作,形成

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协同育人格局，更好地开展交叉、开放式教育。

《瞭望》：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学校教学革新与师资培养机制转型？

杨宗凯：数字时代，高校育人方式、教育环境正经历显著变化。传统教育场景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二元互动，而今已演变为教师、学生与技术设备的三元互动。人工智能将在知识传授中扮演关键角色，教师在心灵启迪、能力培养、价值引导等育人方面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学生学习方式经历显著转变，从以往仅限于教室的传统课堂，发展到结合线上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例如，学校以建材建工、交通、汽车三大行业为基础，打造未来学术中心。通过虚拟技术远程接入“无人工厂”“无人码头”“无人汽车”等尖端技术与实际应用场景，构建“沉浸式”教学环境。这不仅让学生学习有形的书本知识，也让他们体验无形的实践智慧。

教学变得更加个性化。利用大数据技术，我们能够深入分析学生的学术动态、兴趣点、心理状况等，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业和生活情况。通过深入剖析学生的学习状态、成绩表现和兴趣特长，制定个性化的学习和成长路径，并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帮助他们成就独一无二的自我。

教师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数字化转型为学校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提供精准支撑。学校推进人事“四定”改革，构建过程、结果、增值、综合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破除“五唯”倾向。通过实施分类分层评价机制，依据教师专长和岗位特性制定差异化目标任务，形成“一人一策”个性化发展路径，实现人才评价从标准化向精准化转型，促进教师队伍多维发展。教师普遍反馈负担减轻了，更多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课堂得以涌现。

聚焦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核心任务，我们对影响学校发展的70个关键数字化指标进行实时监测，以实现对学科、学院、专业和课程等全方位的科学评价数字画像。通过构建干部、教师和学生的能力图谱，致力于打造人才画像系统，重点推动从“数量画像”向“质量画像”的转变。

武汉理工大学是全国首家“全程线上不入校”审核评估试点高校，基于数智化治理体系的“无感式”评估模式为深化教育评价体系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形成了示范效应。

同时，学校有组织科研水平显著提升。如今，科研任务到来，我们无需再经历冗长的会议和任务分配流程。通过大数据分析，根据科研任务的领域、目标任务以及全校教师的“人

才画像”，我们能精确匹配到合适的科研人员，并自动组建团队，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得益于此，近年来学校的学科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果，在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大成果、大转化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有效推动了学校整体的发展。

妥善用好 22 亿条数据

《瞭望》：从学校的实践看，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杨宗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从老赛道向新赛道的转换，新赛道的“红绿灯”是什么，技术赋能的边界在哪里，需要进一步明确。

比如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数据驱动，而这些数据直接关联师生的信息。以武汉理工大学为例，每天 22 亿条数据在流动，需要学校和技术提供商共同承担起保护数据的重任，并建立完善的数据管理和安全防护机制。

还有伦理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内容，帮助其有效提升学习效率。但同时，AI 帮写作业等现象越来越突出，带来一系列道德与诚信风险。对 AI 的过度依赖还可能导致学生缺乏对问题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知识背后逻辑的深入分析，进而逐渐丧失主动思考和自主探索的能力。这些挑战迫切要求学校及其他相关方面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政策约束，以确保在发挥数字技术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遏制其潜在的负面影响。

《瞭望》：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学校还将在哪些方面发力？

杨宗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分为转换、转型、智慧三个阶段，要实现从起步、应用和融合数字技术，到树立数字化意识和思维、培养数字化能力和方法、构建智慧教育发展生态、形成数字治理体系和机制，仍需在以下三方面实现突破。

首先，积极融入顶层设计。教育数字化是整个教育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学校要融入系统化的转型中。其次，夯实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持续建设信息网络、平台系统、数字资源、智慧校园、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最后，强化教师数字化水平和能力驱动。要用新标准和新路径来推进大学治理与变革，推动未来学校、未来课堂、未来教师和未来学习中心的创新发展，为培养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瞭望》2025 年第 19 期）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学何为 | 邱勇

阅读提示：作者邱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人民日报》记者吴月根据作者在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成立仪式上的讲话整理。

要将人文精神融入价值塑造，不能让技术算法禁锢人的认知。要让人文情怀引导科学探究方向，不能让便捷的技术替代追问与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和教育评价方式。清华大学 114 周年校庆之际，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成立。这是我们进一步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加强教育学科建设、更好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举措。

一所好大学，不仅要培养优秀人才、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应提出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进而对国家甚至世界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重大机遇和挑战面前，教育学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我们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推动高水平创新人才的知识体系重塑与培养体系重构，把握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成长发展新规律，把技术红利转化为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的“双提升”。

无论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还是大学走出象牙塔，每一次教育理念的重大变革，都会带来教育模式的变化。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应秉持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大学应如何创新办学模式，在支撑强国建设、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发挥更大作用？

要在传承传统中激发创新活力。“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知行合一”等中华优秀教育传统构成了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根基。教育是一项有传承性的事业，守正才能创新。在人工智能时代，必须时刻叩问和坚守教育的本心，绝不能放松对学生的启智、心灵的滋养和基本的认知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教育学要立足新的教育实践，对中华优秀教育传统进行再发展和再转化，让我国的教育思想根脉不断、永葆生机。

要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研究的作用。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其人才培养理念、培养模式、选拔方式等对基础教育乃至教育体系都有“风向标”意义。很多发达国家非常注重以高等教育引领带动科技创新和人才集聚，进而占据国际竞争先机。教育学要大力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深入探索教育数字化转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大学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关键问题，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人工智能时代更要讲人文，教育强国建设更要加强教育学的研究。要将人文精神融入价值塑造，不能让技术算法禁锢人的认知。要让人文情怀引导科学探究方向，不能让便捷的技术替代追问与反思。当学生有了人工智能学伴、教师用上人工智能助教，我们要研究教育教学的新变化新特征，更要思考在人工智能之外，教育如何使人成为人，加强家国情怀和人文素养的养成，促进学生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来源：《人民日报》）

携手共创欧洲未来：欧洲大学联盟的经验 | 欧洲大学联盟

阅读提示：大学能为欧洲的未来做出什么贡献？欧洲大学联盟（NEOLAiA）又将发挥什么作用？在5月9日欧洲日之际，欧洲大学联盟九所大学中的四所大学（比勒费尔德大学、厄勒布鲁大学、哈恩大学和俄斯特拉发大学）介绍了各自的经验和目标，它们展示了欧洲大学合作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以下是它们的经验要点。

作为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沿力量，大学联盟在塑造欧洲未来中发挥着战略性作用。以NEOLAiA为代表的欧洲大学联盟，通过整合九所区域性高校的资源与愿景，构建了以教育创新、研究协作和社会责任为核心的跨国合作框架，致力于推动包容性增长、数字转型与人才流动，为核心欧洲价值观的实践提供制度性支撑。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Bielefeld University）、瑞典厄勒布鲁大学（Örebro University）、西班牙哈恩大学（University of Jaén）及捷克俄斯特拉发大学（Ostrava University）作为联盟核心成员，通过差异化路径展现了区域高校协同提升欧洲竞争力的实践范式。

从教育使命出发，联盟高校将跨文化能力培养与价值观塑造置于首位。欧洲大学联盟主席、厄勒布鲁大学副校长约翰·施尼勒（Johan Schnürer）强调，学生是“连接未来的知识桥梁”，而欧洲大学联盟通过联合课程、混合教学模式、微证书体系及跨国流动项目，系统性拓展学生的全球视野与批判性思维。俄斯特拉发大学通过“焕然一新（To Be NEO）”计划构建开放参与机制，借助学术咖啡厅、混合课程等活动强化学生社群的跨域协同。欧洲大学联盟总协调员、哈恩大学负责欧洲大学事务的副校长阿特丽斯·巴尔韦德·希门尼斯（Beatriz Valverde Jiménez）指出，联盟通过教育创新不仅培养专业能力，更注重植入欧盟核心价值观，使学术共同体成为欧洲认同的孵化器。

在研究协作层面，联盟着力破解非大都市高校面临的共性挑战。比勒费尔德大学主导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工作组通过制定《“焕然一新”章程(NEOcharter)》及最佳实践数据库，建立区域性包容发展标准化框架。该校副校长米凯拉·沃格特(Michaela Vogt)强调，联盟通过诊断制度瓶颈、提炼成员校优势经验，推动欧洲高等教育区的结构性改革。哈恩大学作为联盟总协调方，聚焦数字化转型、包容性政策与流动性增强三大支柱，通过联合研究网络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俄斯特拉发大学副校长雷娜塔·托马斯科娃(Renáta Tomášková)提出，联盟通过跨校团队建设激发内生创新，将短期任务执行与长期愿景相结合，形成应对社会与环境挑战的协同解决方案。

在社会责任维度，欧洲大学联盟将高校定位为区域发展的知识枢纽。比勒费尔德大学通过社区参与机制收集多元声音，将学术研究嵌入地方治理需求；厄勒布鲁大学拓展“教育+”模式，将学分认证体系延伸至课外活动与区域服务，强化大学的社会渗透力；哈恩大学依托联盟平台促进跨域经验共享，推动边缘区域融入欧洲创新链。各成员校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通过欧洲大学联盟构建价值公约数，将“变革地区以建设包容欧洲(Transforming Regions for an Inclusive Europe)”的核心理念转化为可操作议程。

制度创新是联盟深化一体化的关键路径。欧洲大学联盟通过微观机制设计突破传统合作边界：建立跨校质量认证标准，开发数字化协作工具，试行联合学位项目，并通过“欧洲大学倡议”争取政策支持。勒布鲁大学战略官员伊达·诺里·安德森(Ida Norrie Andersson)指出，混合流动、微证书等柔性机制有效降低了参与门槛，使80%的非传统流动学生获得跨国学习体验。此类创新不仅重构了教育资源分配模式，更培育了学术共同体的制度韧性。

面对地缘政治复杂化与技术革命的双重挑战，欧洲大学联盟的实践表明，区域性高校可通过深度协同放大竞争优势。其经验为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提供了三点启示：首先，价值观引领的协作模式能有效调和区域差异；其次，数字化工具与柔性制度是规模化合作的基础设施；最后，将学术使命锚定社会需求可增强联盟可持续性。通过持续优化这三大杠杆，大学联盟正成为欧洲知识经济转型的核心驱动力量，为构建包容、创新、互联的欧洲未来提供结构性支撑。

(来源：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Aktuell Uni Bielefeld)官网)

欧洲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潜在的十字路口 | [西]塞巴斯蒂安·布鲁克

作者简介:塞巴斯蒂安·布鲁克(Sebastián Bruque)是西班牙哈恩大学(University of Jaén)生产与运营管理以及国际管理专业的全职教授,中佛罗里达大学的富布赖特学者。他曾任哈恩大学国际化副校长(2015-23年)和西班牙大学协会国际化分会执行秘书(2020-22年)。他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或与他人合作发表了50多篇论文,是英国、德国、荷兰、瑞士、斯洛文尼亚、以色列、美国和印度等国大学的访问学者,也是欧洲商业教育理事会的委员。

欧洲高等教育体系正经历结构性变革,欧洲学位倡议作为欧盟深化跨国教育合作的核心政策工具,标志着欧洲教育区建设进入新阶段。该倡议旨在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传统合作模式瓶颈,重构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与内部整合度,其演进路径与实施挑战折射出超国家教育治理的复杂图景。

制度创新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中世纪大学形成的学术共同体传统,经1999年博洛尼亚进程获得系统性制度支撑。三阶段学位体系与欧洲学分转换系统(ECTS)的建立,构建了跨国教育合作的底层架构。后续Erasmus Mundus联合硕士等项目通过实践验证了联合学位模式的可行性,其中34国参与的178个硕士项目累计培养34,000名国际学生,为欧洲学位积累了跨国质量保障与课程整合的实证经验。2022年欧洲大学联盟(EUI)启动的10个试点项目进一步揭示了现行体制下存在的50余项制度障碍,涉及学分互认、文凭规范等微观操作层面,凸显制度创新的现实紧迫性。

欧洲学位采用渐进式双轨推进策略,包含标签认证与法律实体授予两个阶段。预备性欧洲学位标签计划通过统一认证标准(含欧洲价值观培养、数字绿色技能模块等12项核心指标)建立质量品牌,预计2025年通过政策实验室制定具体操作指南。完全形态的欧洲学位需突破成员国教育主权限制,建立跨国法律实体授予机制,其核心特征体现为三方面制度优势:相较于现存1587个联合学位项目,行政成本预计降低40%以上;凭借欧盟层面立法保障实现27国自动认证;课程设置强制嵌入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人工智能伦理等跨学科内容。数据显示,采用欧洲学位标签的试点项目国际申请量提升35%,印证其品牌溢价效应。

实施进程面临多维制度约束。法律层面,教育权属的辅助性原则导致11个成员国对超国家认证持保留态度,匈牙利、爱沙尼亚等国明确反对课程标准的“布鲁塞尔化”。质量保障体系存在显著差异,仅62%的欧盟国家实施欧洲联合项目质量认证方法(EA),且执行标

准离散度达 28.7%。经济维度上，多国联合学位生均成本较传统项目高 3,200 欧元，经费可持续性依赖 Erasmus+ 专项拨款机制的完善。教学实践层面，试点项目反馈显示语言障碍使 37% 的跨校课程被迫采用英语授课，引发文化多样性保护争议。

比较分析显示，欧洲学位相对现有合作工具具有显著制度突破。相较于双学位模式，其课程整合度由平均 43% 提升至 70% 基准线；相对于 Erasmus Mundus 项目，认证范围从硕士扩展至本科-博士全周期；在就业市场认可度方面，欧洲 Patent Office 数据显示持联合文凭者跨国执业许可申请耗时减少 22 个工作日。这种制度优势使其可能重塑全球高等教育格局——据 OECD 预测，若全面实施可使欧盟国际学生份额从 21% 提升至 2028 年的 28%。

制度变迁的长期性特征要求构建动态实施框架。政策实验室需在 2025-2027 年间完成三项关键任务：建立成员国立法调整的激励机制，制定跨国教育实体设立标准，开发数字文凭认证系统。欧洲学位论坛应设立成员国承诺度监测指标，将课程融合度、学分互认率等 12 项参数纳入欧洲教育区进展报告。在操作层面，建议采用“可变几何”推进策略，允许先锋国家集团率先实施，通过成果外溢效应驱动整体进程。

这项高等教育治理的突破性实验，本质上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教育领域的投射。其成功与否不仅关乎 850 万欧盟高校学生的学术流动，更深层次检验着超国家机构在文化主权敏感领域的制度创新能力。随着 2025 年政策工具的全面启动，欧洲能否在保持学术多样性的同时实现系统性整合，将决定其全球高等教育领导力的未来走向。

（来源：世界大学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官网）

质量标签还是新学位？欧洲学位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 [瑞士]玛丽亚·凯洛

阅读提示：5 年前，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洲学位的构想。当时，尚不清楚它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即它是授予符合特定欧洲标准的联合课程的质量标签，还是实际的新学位类型。欧洲大学协会的玛丽亚·凯洛（Maria Kelo）对欧洲学位进行了反思，以下是她的主要观点。

作者简介：玛丽亚·凯洛是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机构发展部（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主任，该部门的工作重点是与高等教育学习和教学、认证和质量保证相关的问题。她还是瑞士认证委员会成员和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注册机构执行委员会成员。玛丽亚·凯洛还曾担任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主任十余年。

自2020年欧盟委员会首次提出欧洲学位构想以来,该倡议已逐步演变为兼具质量标签与新型学位特质的双重发展路径。经过五年探索,这一机制的核心特征逐渐清晰:既非单纯的质量认证体系,也非完全独立的新型学位,而是尝试在国家资质框架内构建具有欧洲特质的联合学位认证模式。该模式旨在通过整合多语言能力、跨文化流动、可持续发展等核心要素,重塑欧洲高等教育竞争力,但其制度设计仍面临成员国政策协同与执行效能的重大考验。

试点项目揭示,当前欧洲联合学位建设存在超过50项制度性障碍。从质量保障标准到学位证书用纸规格,各国在行政程序、认证规则、课程语言等方面的差异显著增加了跨国教育合作成本。欧盟委员会将欧洲学位定位为破解这些难题的创新方案,通过建立统一认证标准简化跨国联合学位审批流程。然而,由于辅助性原则限制,该机制不具备强制约束力,成员国可选择采取质量标签或新型学位等差异化实施方案。这种自愿参与特性可能导致制度碎片化,削弱其解决系统性障碍的效能。

质量标签方案展现出较低的实施门槛与灵活性优势。作为欧洲学位的初级阶段,该标签可由国家质量保障机构授予符合欧洲标准的联合项目,无需改变现有学位认证体系。这种渐进式路径既能推动教育创新实践,又可规避大规模法规修订带来的政治阻力。相比之下,新型学位方案要求成员国同步调整国家资历框架,这在当前部分国家对教育主权让渡持保留态度的背景下,可能延缓整体实施进程。欧盟大学协会强调,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必须确保欧洲学位机制与博洛尼亚进程现有工具协同发展,特别是强化利益相关方在质量保障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制度创新的深层挑战在于平衡统一标准与成员国多样性。尽管欧洲学位被寄予提升欧洲教育吸引力的厚望,但各国内部对“欧洲特性”的具体界定尚未形成共识。跨学科培养、数字技能等战略要素的课程融合,需突破传统学科边界与评价体系。同时,联合学位建设的高昂时间与经济成本,要求欧洲学位必须具备明确的市场认可度与就业竞争力,这对质量保障机制的公信力提出更高要求。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学位试点暴露出行政简化与教育创新的内在张力——过度侧重程序优化可能弱化其推动教育实质性变革的初衷。

从政策演进视角观察,欧洲学位的最终形态将取决于成员国立法协调与院校实践反馈的相互作用。虽然质量标签可作为快速启动方案,但其象征意义可能大于实质影响。要实现真正的制度突破,仍需解决学位授予权归属、跨国质量评审机制、学分互认深度等根本问题。欧盟高等教育界普遍认为,该机制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自下而上的院校驱动力,而非单纯依赖政策推动。这要求欧洲学位标准既能彰显学术卓越,又可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实践框

架。

当前进程凸显出欧洲教育一体化面临的深层矛盾：跨国教育合作需求与成员国教育主权的博弈、制度创新诉求与传统质量保障体系的冲突、战略愿景设定与具体实施能力的落差。未来欧洲学位的发展，既需要延续博洛尼亚进程的渐进改革路径，更需构建多方利益平衡机制。只有确保质量认证标准与院校自主创新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提升欧洲教育竞争力的终极目标。正如文末纪念的 Tia Loukkola 所启示，欧洲高等教育整合既是制度建构过程，更是教育理念的持续对话与革新。

（来源：世界大学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官网）

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关键问题的制度理性视角 | 眭依凡 李芳莹

作者简介：眭依凡，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李芳莹，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制度建设与完善是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在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及其重要性，以及制度概念及其理论解读的基础上，阐释了制度与高等教育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性。继而从高等教育治理主体必须强化制度之于高等教育治理重要性的理性认识，政府必须加强有利于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建设，大学必须加强回归大学本质属性与核心使命的制度建设与完善，讨论了基于制度理性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行动选项。

关键词：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制度理性；高等教育宏观治理；大学内部治理

由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并藉此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属性，赋予了无论作为国家事业还是社会活动的高等教育具有极其强烈的社会性。故此，高等教育体系绝非是可以与社会隔绝的封闭系统，而是边界模糊甚至无疆界的以知识开放为特征的社会巨系统。构成这一巨系统的主体包括高等教育系统内外部所有利益相关者，如作为高等教育举办者的政府主管部门、作为高等教育实施者的大学集群、作为高等教育消费者的学生及其家庭、作为高等教育产品接受者的社会和市场，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投资者等，上述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然而，由于政府是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的主体，而大学集群是实施高等教育的主体，为便于集中讨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高等教育治理模型可简化为：宏观治理主

体即政府和微观治理主体即实施高等教育的大学集群。尽管二者在治理重点与权责上不同,但二者均为高等教育治理最重要且高度关联的主体。因此,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应该从宏观治理和微观治理两个层面切入。此即,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必须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框架下,既要回答有关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诸如基本规律理性认识及政府宏观治理等方面的共性问题,又要回答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诸如大学分类发展及其办学治校之改革实践等方面的个性问题。若以与时俱进之高标准审视已历经十年之久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探索实践,效果虽显却仍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或许还有关键问题尚未解决。那么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本研究认为:就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而言,其本质或关键是制度建设及其完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亦然,这就为我们从制度视角切入高等教育治理及其现代化奠定了认识基础。

一、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解读及其重要性

深度解读高等教育治理及其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之重要性加以讨论,这是本研究解决价值层面认识问题之必要。

(一) 概念解读: 高等教育治理及其现代化

治理作为一种在领导层权力体系主导下,协调管理层、执行层及其成员共同参与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具有多主体性、整体性和效率性等特征。具体而言,治理的多主体性表现为,其运作基础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即垂直控制,而是协调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管理及共享管理;治理的整体性主要指组织之间及其成员相互依存的框架性关系结构;治理的效率性体现为,治理是在公共目标支配下强调效率的管理活动。高等教育治理作为一个以提高治理效率为目的的复杂多层次系统,涵盖了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两大核心要素。作为要素一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是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的组织结构及其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概念,其规定了治理体系内部诸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具有相对静态性,主要通过包括基本制度与工作制度在内的制度性设计以保障治理框架的完整和稳定。其中,基本制度框定治理的组织结构及其权力结构,工作制度保障治理的具体运行机制。作为要素二的高等教育治理过程包括治理主体和治理能力,治理主体即指高等教育系统内外部所有利益相关者;治理能力强调治理结构诸要素在治理过程中的工作效能表现,尤其是反映治理者能否充分发挥组织诸要素作用的效能概念。相对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受治理者素质的影响极大,其非稳定的动态性特征更为突出。

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其不仅是高等教育系统从以控制为手段的传统管理方式向以效率效能为目的的现代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亦是按高等教育属性规律并以高等教育的高质量、高水平和高效率发展为目标追求的、富有国际竞争力并极具先进性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其核心要素如图1所示,包括治理理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由于大学集群是保证高等教育活动得以发生的、以实施高等教育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是故笔者以大学为例讨论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其一,关于治理理念的现代化是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向度和实践引领,旨在回答“大学为何需要善治”这一认识问题。其基于“大学本身就不是一个‘统治’的组织,当下的大学管理面对诸多挑战以及大学必须找到效率更高的新的管理模式”这一逻辑前提,对高等教育治理政策制定、价值观形成以及行动方向选择,乃至引领治理结构变革和治理能力提升均具有深刻影响。其二,关于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是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设定与关系规范,旨在回答“大学如何实施善治”这一操作性问题。其具有整体性、协同性和层次性等特征,要求通过推进系统化、协作化和分权化的治理方式以适应多样与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增强高等教育治理的合法性和行动效率。此外,治理结构的现代化亦是治理理念得以践行和治理能力得以提升的载体。其三,关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与质量保障,旨在回答“大学能否实现善治”这一效能性问题。其以涵盖“思想力”“组织力”“决策力”“制度力”“资源力”“文化力”及“校长力”等多个领导力要素构成的结构性领导合力亦即



图1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核心要素

“大学领导力”为核心,决定了大学能否有效应对复杂治理问题并实现既定的治理目标,是治理结构能否发挥作用和治理理念能否引领治理实践的关键。

(二)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

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须率先解决两个基本认识问题:其一,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何在?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观背景下。其二,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应该解决什么问题及如何解决?回答这一问题则必须针对掣肘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并从高等教育治理的底层逻辑

辑寻找化解困境之道。

首先,讨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问题。由于“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坚实基础。因此,有必要把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之重要性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共同特征可以理解为,中国式现代化亦必须在具有国际比较意义上的现代化要素方面,体现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水平及发展实力。诸如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等均可视为具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要素。然而就上述诸要素而言,高等教育以其强大的生产力属性对国家发展及社会进步更具直接性及动能性,亦是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和动力,从而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有鉴于此,不仅《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必须实现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提升”这一阶段性目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更明确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视为包括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内的教育现代化目的所在。缺失了率先致力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行动,我们将难以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现代化强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之于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前置逻辑关系,决定了高等教育治理率先现代化的重要性。此外,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重要性还体现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其不仅关涉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治理结构的创新与治理能力的提升,亦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基本保障。

其次,讨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应该解决什么问题及如何解决的问题。为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大势,我国高等教育及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建设开展了诸多有益探索,但仍然面临不少困境,比如对治理的认识不够深入、治理理念不够明确、治理的基本制度与工作机制尚不健全等,由此导致治理效率偏低、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既然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奠基及引领之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到位,而且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也已清晰,因此,当前最为紧迫的工作是找到解锁问题链的关键所在。从高等教育治理得以发生且有效和持久的底层逻辑思考破解之道,这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且具有牵住引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之“牛鼻子”的价值。如前文笔者对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及其能力的概念界定,制度及其建设与完善无疑是治理及决定其成效之底层

逻辑的关键要素。正是此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把“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首要,而且特别强调必须把“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由于制度之于治理现代化具有基础性、保障性及导向性,由此决定了加强制度建设与完善既是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问题,亦是高等教育治理现实困境的破解之道。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为实现以质效提升为目标、以善治为旨归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既要立足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求,亦要突出中国式现代化之国情特征,故我国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之制度建设必须具有本土适用性,这一适用性的直接体现即制度的完善。

二、制度及其与高等教育治理的逻辑关联性

基于底层逻辑的分析,上述虽然提出了制度及其建设与完善既是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亦是根本解决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的关键路径。但这一结论是否成立,有待通过论证明确两者间的逻辑关联性。

(一) 制度概念及制度理论解读

无论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还是组织治理实践的重要概念,关于制度的界定因学科研究的需要或治理实践的要求而各有侧重。如政治学将制度视为嵌入在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程序、规则和惯例,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提供稳定且可预测的行为框架以促进政治体系的有序运作和社会有效治理。管理学把制度界定为组织内外部的规范、准则及程序体系,其核心功能在于促进协调管理过程、提升组织运营效率以及增强组织竞争力。经济学则关注制度如何通过结构化的激励机制影响个体和组织决策,从而增进整体经济绩效,将制度界定为包括法律法规、产权保护、市场规则、合约执行机制等在内的影响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体系,其核心功能在于减少交易成本、规范市场行为,促进经济效率与增长。社会学视角中的制度概念既包括正式的法律、法规、组织结构和政策,亦涵盖非正式的习俗、传统、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其核心功能在于规范社会行为、分配资源、调节社会关系,并为社会成员提供行为框架和预期。据此,笔者可以把制度概念按属加种差的逻辑要求界定如下:制度是特定社会或组织为维护必要秩序,对组织及其成员的权力、责任、义务与行为进行规定的体系化规则。(见图 2)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制度的操作价值在于对

社会及其组织之间的关系及运行机制,以及社会及其组织成员的关系及个体行为予以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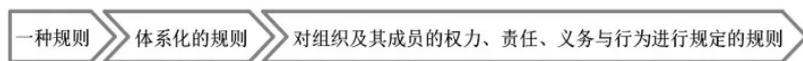


图2 制度的一般概念

规定,从而为社会及其组织及组织内部成员间的互动提供具有约束性的关系框架。

制度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并解释各种制度的产生与变迁,以及制度对社会及组织及其成员具有什么影响及如何产生影响。学界对制度产生、变迁及其作用的解释有着不同的认识逻辑,并由此导致了研究取向及其材料取舍的不同,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但其核心关注无不聚焦于制度对社会活动具有持久稳定性的规范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便强调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其“理性化”概念及其对科层制和权威类型的研究为后来的制度理论奠定了基础。如在经济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奠基者凡勃伦和康芒斯于各自的研究,强调了诸如习惯、惯例、法律等社会制度在塑造经济行为中的核心作用。加尔布雷思继承了凡勃伦和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传统,强调经济行为受到制度安排、文化和权力结构的深刻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在批判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制度安排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塑造经济行为,将制度从外生变量转为内生分析对象,重构了既往经济学对制度的认知,即制度不仅是约束条件,更是经济效率的创造者。诺斯则强调了制度是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决定因素,并将其视为包含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的“社会博弈规则”和互动框架。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制度视为社会行为和组织运作的基础,关注制度构建、变迁及其扩散的动态变化过程。迈耶借鉴早期社会理论家涂尔干、韦伯等的见解,认为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规范和规则的产物,这些规范和规则构成了特定类型的行动者,并规定了它们可以采取的行动方式,其后又与罗恩强调了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结构性影响。斯科特在综合诸类制度理论的基础上假定制度由“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组成,并借由这些基础要素与相关活动和资源建立弹性联结,从而促进社会生活的传播、维持和再生产。制度逻辑理论主张制度环境的多样性与冲突性,个体和组织行为受多重制度逻辑的交叉影响,强调行为者的能动性和制度变迁中的互动过程,促使制度理论从单向的“制度效果”转向更为复杂的“制度过程”分析,亦将自下而上的影响模式涵盖在内。

概言之,制度理论凭借其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框架用于研究从宏观全球框架到微观人际互动等各系统中,为解释组织及其所处环境中的复杂动态变化,以及分析指导组织实践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工具。基于制度会对各种社会及其组织行为和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人们既可以用制度来解释社会及其组织出现的各种相对稳定的框架结构和行为模式,

亦可利用制度来实现社会及其组织相对稳定的框架结构和行为模式。例如，经济学家在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后建立了制度经济学派，从而把制度作为考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分析工具。受此启发，我们亦可从制度理性视角去探究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

（二）制度价值及其作用与高等教育治理的逻辑关联性

我们把组织或有组织的社会统称为社会组织，它们均是制度的产物，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系统亦然。为了明晰制度与高等教育治理的逻辑关联性，有必要从治理视角阐述制度的功能，以此加深我们对制度的认识。

据领导力理论，制度既是领导过程的重要情景要素，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其对治理环境的营造及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构建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组织及其成员个体的行为均可以从组织的制度中找到原因或依据。故此，我们在治理语境中将制度界定为一种以法治文本呈现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及持久性的治理工具，其在治理过程中具有图 3 所示的诸如界定权力边界、确定组织内部关系、消除外部干扰、降低不确定性等基本作用，但制度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治理效率。制度不仅具有规范社会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作用，还具有引领社会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价值。制度对治理的影响之所以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只是制度确保了社会组织运行秩序，更在于其最终确保了组织治理的效率。故此，凡与时俱进的社会组织均有通过不断反思已有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加以修正以提升治理效率的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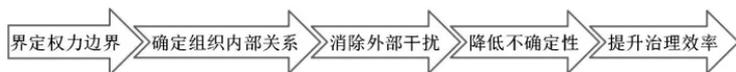


图3 制度的基本价值作用

从社会组织治理的视角，制度的功能可以概括如下：其一，系统架构与动态调试。通过界定权力边界和行为空间，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协调与整合。差异化的制度指向需要对各种可能具有负向外部性的机会主义行为加以约束，从而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其二，资源配置与激励驱动。制度的产生和维系本身是社会环境引发的竞争压力的结果，其必须承载改善社会资源条件与经济效益的功能诉求。作为利益获得和目标达成的重要保证，制度通过设置规则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调节利益分配、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其三，价值形塑与伦理规范。制度所给定的特定信息有利于人们在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环境下形成稳定的预期和特定的认知模式，从而指导个人和组织行为。

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在“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贡献突出

的三位制度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就是对制度之于国家治理具有关键影响的最好证例。也正是基于制度之于国家竞争力的极端重要性,从事国际竞争力评价的世界经济论坛,其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亦把制度作为评价国际竞争力的12个支柱项目之首。由此足见,制度设计的质量既是导致国家及地区在技术、物质和人力资本等差异的关键因素,亦是导致社会组织治理效率高低的的关键要素。

通过基于治理视角对制度理论的分析,制度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关系显著呈现。可从以下两方面切入加以阐释:其一,如前所述,由于高等教育治理包括两大层面,一是体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框架的治理结构,二是反映治理主体及其治理能力的治理过程。因此,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必须以上述两者协调同步的现代化为基础,任何一方的缺失都难以达成提升高等教育治理效率的目的。其二,高等教育治理之组织结构及其权力结构本身就是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的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亦即工作制度的概念,而高等教育治理能力虽然是关于治理结构诸要素在治理过程中的工作效能表现,尤其是反映治理主体能否充分发挥组织诸要素作用的效能概念,但其治理主体是在治理体系亦即反映治理基本制度和工作制度规定的框架下发挥作用的。据此,制度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关切性进一步得以证实。正是基于两者的高相关性,我们必须把与基本制度设计及运行制度安排高度相关的管理体制与机制改革,视为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之首要。就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本质而言,其本就是按高等教育规律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发展且富有国际竞争力及时代先进性的治理模式,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治理及依法治理的具体体现,而其前提和保障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就实施高等教育的主体大学而言,其作为学术组织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大学必须是一个高度理性的社会组织,其理性既来自大学文化的历史基因,更来自大学制度与时俱进的改革与完善。大学必须重视制度构建和完善以提升治理效率,可以概括如下:其一,由于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基本职能的实现,以及附着在大学组织知识属性之上的诸如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带来大学内部治理的高度复杂性,从而决定了大学是需要有效治理的组织;其二,组织的有效治理要求大学必须建立一个既能围绕核心使命运行,又能调动各级学术机构及其成员主观能动性与创新潜能,确保大学目标实现的大学制度。因此,大学的有效治理依赖于有效的大学制度。可以说,教育部先后对我国高校提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及建立完善大学章程的要求,就是基于制度之于大学内部治理的重要性做出的准确判断和重大选择。关于制度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强调:“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高等教育治理及其现代化亦然,必须在高等教育的科学制度体系及由其形成的制度理性下进行,此即制度之于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

三、基于制度理性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行动

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有必要重申如下:其一,高等教育体系是反映国家科技竞争力强弱的战略构成;其二,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在国际高等教育坐标系上,体现其在比较意义上具有的比较竞争优势;其三,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审视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强国的共同特征和不可或缺要素。在此基础上,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目标可概括为:有利于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及加快实现高等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以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在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及其目标清晰的前提下,基于制度理性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行动之紧迫性愈加凸显。

(一) 高等教育治理主体必须强化制度之于高等教育治理重要性的理性认识

高度成熟的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行动皆受制于理性认识,理性认识通过决定组织及其成员行动的目的、目标以及采取基于目的、目标实现的行动,从而决定社会组织及其成员行动的效能。故此,任何社会组织的行动及其结果很大程度是被社会组织及其成员所持的理性认识预先决定的,即理性认识必须先于行动及引领行动。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行动亦然。无论是负责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的政府机构还是以实施高等教育为己任的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必须认识到缺乏制度建设和完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将失去体制机制的保障,任何旨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行动尤其是涉及治理改革的复杂行动都会出现诸多的不确定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强调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两者都旨在强调制度理性之于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和引领性价值,这对我们强化对制度的理性认识以科学引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行动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尽管作为政府宏观治理层面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与大学微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行动重点不同,但目的是共同的,即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积极作用,提

升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为达此目的,治理主体必须强化制度引领高等教育现代化行动的理性认识,通过制度建设、完善及创新,一方面为维护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运行的必要秩序以减少高等教育现代化及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努力扫除掣肘高等教育现代化实践行动中的制度障碍,为根本提升高等教育治理效能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

(二) 政府行动: 加强有利于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建设

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教育、科技与人才竞争实力的重要载体,以及促进三者一体化的核心力量,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与人才资源开发战略的深度耦合,并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尤其是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及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尤其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现代化需以高等教育强国、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以及高等教育竞争力提升为价值引领。在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正加速重构。如何抓住这个时机提升具有第一生产力属性的科技竞争力,以及具有第一资源属性的人才竞争力,以根本解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问题,是高等教育宏观治理层面的关键所在。由于高等教育宏观治理及其现代化作为国家战略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性,是故其制度建设必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框架下,以高等教育宏观治理效能优先为价值引领,从而根本避免关涉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层面的碎片化改革发生。

概括起来,基于政府层面的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的制度建设重点如下:其一,来自政府层面的高等教育治理,亟需破解教育科技人才管理系统的制度性割裂,加快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根本解决在政府治理层面导致的教育、科技、人才分散管理的制度设计问题。我国正在实施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创新走廊”计划,旨在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国际化合作、培养新型人才、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多方面的努力,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以推动有利于区域经济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模式,就是一个基于基本制度建设根本解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问题的良好开端。西方亦有诸多成熟的案例,如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之间的合作模式以市场自发为主导,辅以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从而形成一个高效、动态的产学研协同生态系统。这种模式之所以成功,既取决于大学与企业间的长期良性互动,也取决于政府在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其二,为推进来自政府层面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必须突破政府宏观治理主体与大学主体之间的传统科层制管理范式,努力构建符合知识传播与生产规律的高等教育制度生态,亦即在国家高等教育宏观治

理的制度供给上,要充分考虑以实施高等教育为己任且最具高等教育基础性的大学主体,其与生俱来的知识开放系统的属性特征,积极营造有利于大学按自身属性规律发展的制度环境。就现状而言,来自政府层面的高等教育宏观治理,仍需通过“松绑-赋能-激活”之制度供给以形成有利于激发大学创新活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三重机制。其三,高等教育治理质量提升需要建立多维度的分类评价体系。加快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政府层面应积极推进高校的分类及投资、绩效评价制度改革,以引领和规范各类各级高等教育机构围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自觉于并安心于自身的属性及层次定位,为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及知识创新作出积极贡献。

(三) 大学层面: 加强回归大学本质属性与核心使命的制度建设与完善

在治理现代化语境下,高校组织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构成治理效能提升的辩证统一体。价值理性聚焦于办学治校的目标导向,强调组织治理效率最大化;工具理性则体现为制度规约下的治理具体路径,以法治化运行机制与民主化决策体系的耦合为表征。二者协同构成大学内部治理场域,形成“目标-手段”相统一的治理闭环,前者确立“为何治理”的价值目标,后者解决“如何治理”的方法选择。大学内部治理本质上是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内部制度和组织及权力架构科学设计以合理调节大学内部各利益群体关系,充分调动和发挥大学内部要素尤其是组织成员积极性,使决策、管理及执行各组织层级及其成员目标一致并保持良好互动关系的,有利于高效实现大学组织目标的现代治理系统。

关于有利于推进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理性,必须遵循“制度-结构-能力”三维契合的逻辑框架,此即:其一,创新制度供给,构建善治导向的章程完善与依法治校体系。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历经深刻变革,其制度转型可追溯至《高等教育法》的立法实践。在法律框架推动下,大学角色逐步转变为依托大学章程实现规范办学的治理实体,由此标志着大学法治建设的突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就明确提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应提升依法治教水平。以实现善治为目标的大学治理旨在以良法为基础,保障大学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的连续性、一致性及权威性,致力于推动基于法制的大学治理体系完善和基于法治的大学治理能力提升。大学章程作为大学内部治理的总体设计方案,是对各权力主体及职能部门权责的定位及其运作程序的制度化规定和规范性诠释,依法治校通过大学章程和相关制度安排,规范大学内部治理行为,确保各项事务运行机制的合法性、效率性和公信力。其二,优化治理结构,完善多元共治的治理生态。大学的内部治理体系,同样包括对大学组织结构及权力结构做出规定的基本制度,以及对大学运行机制做出规定的工作制度。为

实现善治目标,以智力劳动为组织特征的大学,其人才培养及知识创新均为极其依赖大学内部教学科研组织及其成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学术活动,其内部治理难以适应传统科层制的管理模式。是故大学的制度建设及完善,必须构建有利于学术组织及其成员智力资源开发、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知识创新水平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及原创性知识贡献的学术组织生态,以充分反映大学内部治理要求又适切大学自身规律,并最大化提升大学整体治理质量和效率。其三,回归核心使命,创新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制度体系。大学本质上是一个集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运用于一体的开放系统,因为自身鲜明的生产力属性而凸显其强烈的社会担当及国家使命。基于目前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仍然停留在治理理想甚而治理概念的层面,难以深入落实到大学内部治理的具体实践,诸如人才培养治理、科学研究治理、人才队伍治理、资源科学配置治理等关涉大学核心使命和社会职能的制度建设依旧未引起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不仅突出且具有普遍性的现实,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必须回归大学本真和核心使命,加强大学安心于并致力于人才培养及其质量提升,以及安心于并致力知识创新及其竞争力提升的制度体系创新,以此确保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具有针对性并实现其根本价值。

就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而言,制度对其产生的影响力即与治理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制度执行力。制度之所以对高等教育治理行动具有规范及引领的作用,均以制度能有效执行为前提,只有可被落实的亦即执行的制度才是现实的制度。故此,即便从制度理性的视角强调制度建设与完善之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关于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制度建设是可被有效执行的制度。此即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5期)

新文科 2.0 建设的理念、思路与重点举措 | 张斌

作者简介:张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成员,教育部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第八届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秘书长。

摘要:新文科建设是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新文科 2.0 作为新文科建设的新阶段,承载着推动我国文科教育创新变革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在此背景之下,亟须革新对文科教育的陈旧认识,统筹优势资源构

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化教育生态,坚守知识生产与应用一体化、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开放包容与本土特色兼顾的理念,通过重构课程体系,建优师资队伍,推动科研创新,不断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夯实新文科建设的基础,推动新文科 2.0 实现高水平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新文科 2.0; 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 理念创新; 教育强国

高等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当前,教育强国建设进入蓄势突破、全面跃升的关键阶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节点,新文科 2.0 建设承载着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变革、助力国家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这为高质量谋划和推进新文科 2.0 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因此,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准确把握文科教育面临环境的深刻变化,增强以新文科 2.0 建设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感。

一、新文科 1.0 的回顾与反思

在我国文科教育发展的历程中,新文科 1.0 开启了文科教育改革的新篇章,其以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交叉融合为核心,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数字人文、人工智能法学等新兴专业的设立,深度融合了人文社科与前沿科技,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边界和职业发展路径。然而,深入审视新文科建设的现状,受限于各地各校办学的思想理念、基础条件、师资队伍和资金等因素,新文科 1.0 建设存在诸多局限:各地各校在理解和践行新文科理念时存在显著差异,部分院校仍秉持传统文科教育思维,过于强调学科的独立性与专业性,新文科建设中的学科交叉往往停留在形式层面,不同学科间缺乏深度的协同创新机制,无法实现知识的有机融合与创新,导致跨学科项目难以产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跨学科课程未能真正发挥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作用;在新兴技术应用方面浅尝辄止,未能充分挖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文科教育教学模式和研究方法的变革潜力,未能充分发挥新兴技术对文科领域研究的赋能作用;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上,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不断对文科领域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需求,但新文科 1.0 建设在学科布局、

研究方向设置等方面缺乏对国家战略需求的深入研判,未能实现精准对接,难以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文科领域的需求。

二、新文科 2.0 的新内涵

(一) 理念之新

1.以学生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理念。新文科 2.0 应将学生置于文科教育的核心位置,要将学生视为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客观判断力、主观能动性、独特认知结构与发展潜力的个体,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社会责任感和全球视野。通过构建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体系,满足不同学生的成长需求,鼓励和引导学生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敢于提出新观点、探索新方法,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价值观等方面实现全方位提升,从“小我”走向“大我”。

2.深度融合与创新驱动理念。新文科 2.0 指向的融合应是深度的、系统性的,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深度融合强调文科内部各学科之间、文科与理工科之间,以及文科与产业之间的全方位、系统性融合。如数字人文领域的兴起,便是计算机科学与人文社科深度融合的创新性成果。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聚焦现实问题,打破文科与理工科、文科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推动文科研究领域和教育模式的创新,促进知识的跨界流动与整合,催生新的知识增长点。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人文社科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在历史研究中,借助大数据可视化技术呈现历史事件的时空脉络,丰富历史研究的表达方式;结合新产业需求,创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创新型人才支撑。

(二) 思路之新

1.从学科交叉向学科重塑思路转变。新文科 1.0 倡导的学科交叉更多停留于简单叠加的模式,仅将不同学科知识机械组合。新文科 2.0 则致力于实现学科重塑,其以复杂现实问题为根本导向,突破传统学科壁垒森严的边界,对文科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性的重新梳理与深度整合。例如,在应对数字时代的隐私保护问题时,需要整合法学、社会学、信息资源管理等多学科知识,构建全新的学科研究范式,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操作性的方案,推动新质生产力在数字领域的健康发展。

2.从国内视野向全球视野拓展思路。新文科 2.0 应立足全球,以全球学科前沿动态、多

元文化碰撞交融现象,以及全球性社会议题为切入点,积极参与全球人文社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彰显中国文科教育发展理念的进阶。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新文科 2.0 应该要肩负双向使命。一方面,要积极与国际同行展开深度对话,密切跟踪并汲取国际先进的文科教育理念,如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等方面,吸收国际先进的文科教育理念和研究成果,因地制宜将其融入国内新文科教育体系,从理论创新、研究方法突破等维度,为国内文科教育和研究注入新活力,提升我国新文科建设水平;另一方面,要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精髓和学术研究成果,借助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多边教育合作项目等渠道,将中国特色文科理论体系、蕴含东方智慧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增强我国在全球人文社科领域的话语权,推动中国新文科模式和成果走向世界舞台,实现从国内深耕到全球辐射的发展路径转变,为全球人文社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三) 重点举措之新

1. 强化新兴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在数字时代浪潮下,积极强化新兴技术对文科教育的赋能作用,成为新文科建设的关键着力点。基于此,迫切需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在文科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应用。依托人工智能算法,构建智能化教学平台,实现教学资源的精准推送和学习过程的智能化评估;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打造沉浸式教学场景,突破传统教学时空限制,激发学习兴趣与创造力,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运用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和需求,为教学改进提供科学依据,培养适应数字时代复杂需求的文科专业人才。

2. 构建多方协同育人新生态。新文科 2.0 要构建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多方协同育人的政产学研用全新生态。政府应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高校要优化人才培养体系,企业需提供实践平台和行业需求导向,社会力量可参与教育资源建设。通过多方协同,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育人格局,共同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兼具深厚人文底蕴、创新思维能力与实践操作技能的复合型文科人才,为新文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推动文科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

三、新文科 2.0 建设的理念坚守

(一) 践行知识生产与应用一体化理念

新文科 2.0 建设需打破传统认知中知识生产与应用之间存在的二元对立藩篱,致力于实现二者的有机整合与协同发展。在知识生产端,鼓励文科教师积极主动地面向复杂多样的实

际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扎根于社会现实,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形成具有创新性与实用性的研究成果,最终将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如在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发展策略,并应用于实际产业发展中,为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孕育、培育与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与坚实支撑,实现从知识到生产力的高效转化,彰显新文科知识生产与应用一体化的实践价值。

(二) 践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

新文科教育应兼顾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培育。人文精神赋予文科教育深厚的文化底蕴、价值关怀与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则为文科教育注入实证、理性与创新的要素。将科学精神融入文科教育,有助于引导学生在拥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同时,也要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如在历史研究中,借助科技手段如地理信息系统(GIS)对历史地理变迁进行可视化、定量化研究,精确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人口迁徙路径、城市兴衰轨迹等复杂历史现象,突破传统历史研究仅依赖文献资料的局限,深化对历史现象的理解,拓展历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实现人文与科学精神在知识探究过程中的有机统一,培养出既具人文素养又有科学思维的复合型文科人才。

(三) 践行开放包容与本土特色兼顾的教育理念

新文科2.0建设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拓宽学术视野,推动国内文科教育理念、研究方法与国际教育界的互动。同时,新文科2.0建设不可忽视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传承,要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梳理中华文化脉络,立足中国国情和学科发展规律,加快建设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如在文学研究领域,可借鉴西方文艺理论聚焦中国古典文学,从文化内涵、审美范式、创作手法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与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价值,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以国际化表达推向世界,增强中国文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实现开放包容与本土特色的平衡兼顾,推动新文科在国际舞台上的特色化发展。

四、新文科2.0建设的思路探索

(一) 重构课程体系

1.开展跨学科课程整合。面对新文科建设倡导的学科融合理念,亟须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围绕复杂现实问题和新兴研究领域,整合多学科方法,对不同学科知识进行有机融合与结构

化重组,设计跨学科课程。如开设“数字社会与人文治理”课程,融合信息资源管理、社会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知识,培养学生应对数字时代社会治理问题的能力,继而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数字经济、智能社会等领域对具备多元知识结构与问题解决能力人才的迫切需求,为新文科人才投身新兴产业、推动社会创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设置前沿与实践课程。紧密跟踪学科前沿动态和社会发展需求,设置前沿课程和实践课程,是新文科 2.0 课程体系与时俱进、保持生命力的关键。前沿课程建设要聚焦最新研究成果、学术热点和新兴理论范式,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提升学生对学科发展方向的前瞻性认知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课程要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通过实际项目锻炼学生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实践导向的课程设置,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与实践操作能力,更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团队协作能力,契合教育强国建设对文科人才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要求。

(二) 优化师资队伍

1.提升教师的跨学科素养。新文科 2.0 强调学科交叉融合,对教师的知识结构与能力体系提出全新要求。高校应积极组织多元形式的培训活动,可以围绕学科交叉的前沿理论、实践案例,以及研究方法进行深入剖析,加强对现有文科教师的跨学科培训,可以通过举办学术讲座、工作坊、短期进修等方式,提升教师的跨学科知识和能力。同时,鼓励文科教师和理工科教师开展跨学科合作,共同针对复杂现实问题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共同设计跨学科课程,发挥各自学科优势,丰富教学内容与方法,打造适应新文科 2.0 建设需求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2.改革师资评价体系。建立全新的适应新文科 2.0 建设的师资评价体系,加快革新以论文数量和科研项目级别与数量等量化指标为主的单一评价方式。要注重对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的评估,尤其是关注教师在跨学科教学、课程设计、实践教学、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表现,鼓励和引导教师开展创新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跨学科教学与研究、实践育人以及社会服务等领域不断探索,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新文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三) 推动科研创新

1.鼓励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面对当今社会高度复杂、交织多元的问题情境,要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组织跨学科研究团队,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等优势资源,开展协同创新研究。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热点,如数据治理、乡村振兴、区域发

展、文化传承等，整合多学科资源，开展综合性研究，切实为国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保障，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各个相关领域的稳健发展。

2.推进科研平台建设与合作。科研平台是有效开展科学研究、汇聚科研资源、培养科研人才的重要载体。要加强新文科科研平台建设，整合区域、校内文科资源，依据学校学科特色与区域发展需求，打造具有特色和优势的科研创新基地。同时，积极拓展科研合作渠道，开展校际、校企、校地合作，注重资源的优化配置，拓展科研合作渠道，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新文科科研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科研价值的最大化。

五、新文科 2.0 建设的重点举措

（一）加强教学资源建设

1.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要加大对数字化教学资源研发的投入力度，加强数字教材建设与推广，设立赋能新文科 2.0 建设的教学资源库。要整合各类优质课程资源、学术文献、案例库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教学资源的智能化推荐和个性化服务。开发智能教学辅助工具，如智能写作助手、虚拟学术导师等，借此洞察学生的学习偏好、知识掌握程度以及能力发展水平，弥补教师资源的相对不足，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2.优化实践教学基地。结合国家战略对文科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建议高校进一步加强与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的合作，建立一批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创新实践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社会实践等机会，搭建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适应国家需求的文科人才。如在高校与政府部门合作方面，可以聚焦政策制定、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为学生提供参与政策调研、数据分析、项目评估等实践机会，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1.开展本硕博贯通培养。探索和推进“项目制”本硕博贯通的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打破本科、硕士、博士培养阶段之间相对独立、衔接不畅的壁垒，构建一体化、系统性的人才培育体系。这一模式要求围绕国家战略对高层次文科人才的新要求，制定覆盖本科至博士全学段的一体化培养方案，实现课程体系、科研训练、实践教学等关键环节的有机衔接与协同递进，真正培育出具有深厚学术素养、扎实专业功底与卓越创新能力的高层次新文科人才，

为教育强国建设储备高端文科人才资源，助益我国在全球人文社科领域竞争力的提升。

2. 培育创新和创业人才。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新文科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强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和实践平台建设，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高校要为学生自主创业与高质量就业创造有利条件，通过模拟创业项目、创业竞赛等活动，让学生在项目运作中锻炼团队协作、项目管理、市场开拓等能力，同时可以邀请创业成功人士、投资专家等担任指导教师，为学生提供创业咨询、项目评估、融资指导等支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此外，高校要为学生提供创业指导和个性服务，以创新型文科人才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各领域的蓬勃发展，助力我国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与转型。

（三）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

1.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积极举办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研讨会等交流活动，搭建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围绕新文科领域的前沿议题，如数字人文的跨文化传播、全球治理中的文科理论创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与价值倡导等，组织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研讨，吸引国际顶尖学者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展示全球新文科研究动态，为国内文科教师与学生提供主场交流的机会，提升其在国际学术舞台的参与度。鼓励和支持文科教师和学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动态，展示新文科建设成果，汲取国际学术精华，反思自身研究，优化研究思路，提升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促进知识的跨国界传播与创新。

2. 拓展国际教育合作项目。国内高校要加强与国外知名高校的文科教育合作，深入开展联合培养、交换生、双学位、游学等多样化的教育合作项目。引进国外优质教育方法和资源，汲取不同教育体系的优势和经验，包括教育理念、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教材以及国际化师资等，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与国内新文科教育实际相结合，提升我国新文科人才培养质量，切实培养出一批具备全球视野、熟悉国际规则、拥有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文科人才，为新文科 2.0 建设注入国际活力，促进中国新文科教育在全球教育格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5 年第 1 期）

他山之石

美国高等教育衰退，中国该怎么办？ | 张端鸿 刘虹

日前，三位全球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Altbach、de Wit 与 Leask 在《大学世界新闻》联合撰文，提出“美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缓慢却深刻的衰退”。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国际学术界引发广泛关注。它并不单是对美国高校当前困境的悲观陈述，更是一种面向全球高教未来的预警信号。在国际教育格局悄然转变的背景下，中国高校不能只是观察者，而应当成为有准备、有担当的行动者。

文章指出，美国高等教育的衰退不是偶发性的“管理失误”，而是结构性危机的结果：政治干预加剧、治理机制分化、财政支持削弱、社会信任流失等多重因素交织，使高校逐步丧失其制度独立性与社会领导力。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联邦政府，日益将高校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战场，通过削减经费、重构监管、干预课程，挑战大学自治的根本原则。这一趋势不仅影响到国际学生的流动与选择，更动摇了美国大学长期以来所代表的自由、开放与学术卓越的形象。

作为全球最大国际学生输出国，中国高校对这一变化格外敏感。部分声音主张，趁美国高等教育处于困境之中，应当扩大中国高校在国际排名和科研话语权中的影响力。然而，这种“替代逻辑”未必是成熟策略。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不只是科研产出与论文数量的累加，更依赖制度规范、学术文化与全球信任的长期积累。如果仅以“赶超美国”为目标，很可能在重蹈“唯指标论”的覆辙之余，忽视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现代性及知识体系。

面对美式大学模式的动摇，中国高等教育的应对路径应更加内省与深远。首先，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提升大学治理的透明度、稳定性与自主性，构建真正具有国际合作吸引力的体制生态。其次，应从“国际流动”转向“全球合作”，不再将留学、引才等视为单边输入输出，而是在气候、健康、技术伦理等全球议题中，以共同体姿态参与规则制定与知识生产。

此外，美国高等教育的衰退也意味着全球学术格局的“去单极化”。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等教育多极共存、文化多元共生的新阶段。在这个背景下，中国高校不宜追求制度替代或文化输出的主导性，而应致力于打造可持续、可信赖、负责任的知识平台与合作机制。这既

包括加强与欧洲、东盟、非洲等地区大学的制度对话,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的规范化、系统化与成果导向,也包括仍然竭尽所能积极维护全球学术共同体,尊重全球高等教育的多样性,促进各国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以及知识与人才的全球流动。

当美国高校在政治干预与财政收缩中陷入自我纠结时,中国高校恰处于战略窗口期。这个窗口期,不应被理解为“追赶美国”的竞赛起点,而应作为“建构自我”的制度机会。在全球高教走向再平衡的历史时刻,中国的选择,关乎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方向。

(来源:里瑟琦科教观察微信公众号)

日韩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的动向分析 | 梁荣华 孙洁琦

阅读提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要求,“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学科融合发展,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超前布局、动态调整学科专业,优化办学资源配置”。今年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提出要把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作为改革重点。本期专题将从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有效机制构建、超常布局国家急需学科专业、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等角度探讨如何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促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摘要:日韩基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凸显前瞻性与融合性及因地制宜合理配置资源三项主要原则,采取强化国家政策支持、优化学科生态体系及深化国际协作三方面支持策略,对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实施调整优化。我国应从四方面统筹推进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确立基本原则,凝聚战略性学科建设共识;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加强战略性学科系统部署;强化多主体协同治理,打造战略性学科生态体系;探索国际化新路径,形成战略性学科发展合力。

关键词: 战略性学科; 国家战略产业; 人才培养; 日韩

在科技竞争日益激烈且尖端产业领域呈现“逆全球化”的国际趋势下,日韩两国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调整优化,重点培育战略性学科,全力应对全球技术格局变化与挑战,确保在国际竞争中抢占优势地位。本文着重对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的概念内涵以及日韩两国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的原则与支持策略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的调整优化提供参考。

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的概念内涵

日本向来重视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对国家发展的关键支撑作用。日本《综合创新战略(2024)》指出,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应对日益恶化的全球安全环境并在围绕关键技术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科学技术与创新仍是重要推动力,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转化、研发能力与人才培育能力的突破提升、创新生态系统的完善优化是确保科技创新的三大支柱[1]。依据2024年6月颁布实施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2024年11月发布的《关于第七次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规划的提案》、2021年3月发布的《第六次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以及2021年以来各年度的《综合创新战略》,日本高度重视尖端技术研发,并出台支持尖端重要技术领域的《经济安全保障重要技术培养计划》。尖端重要技术领域直接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发展需求,以此提升日本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因此,日本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聚焦尖端重要技术领域,紧密围绕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和全球科技前沿趋势,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战略需求导向,并根据政策不断调整学科设置和资源分配,通过培养创新型人才和推动技术创新,确保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获得独特优势。

韩国2022年8月颁布《国家尖端战略产业竞争力提升及保护特别措施法》(以下简称《国家尖端战略产业法》),并于2024年1月进行最近一次修订,该法令对“国家尖端战略技术”和“国家尖端战略产业”等概念予以界定。其中,国家尖端战略技术是指对国家与经济安全影响大,与出口、就业等国民经济效益密切相关以及会对相关产业产生显著波及效应的技术;国家尖端战略产业则指为研究、开发尖端战略技术及推动相关技术商业化提供必要产品与服务的产业[2]。在此基础上,韩国分别于2023年2月、5月、7月和2024年3月发布《尖端领域人才培养战略》《第一次国家尖端战略产业培育基本计划(2023—2027年)》《理工科人才支持方案》和《2024年尖端产业人才培养训练营实施计划》,围绕人才培养与产业培育进行具体部署规划。因此,韩国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聚焦于能够为突破尖端战略技术、发展尖端战略产业及培养尖端领域人才提供关键支撑的学科,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并根据需要实施动态调整。

近年来,我国颁布出台的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文件也高度关注战略性学科的建设与优化。2018年9月,《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指出,动态调整专业结构,主动布局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网络空间安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关学科专业;2022年1月,《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鼓励建设高校着力发展

国家急需学科，以及关系国计民生、影响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学科；2023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中指出，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世界科学前沿、关键技术领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科，建好建强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

整体而言，日本的尖端重要技术领域学科、韩国的尖端产业领域学科与我国提出的战略性学科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学科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基于中日韩三国视角，本文将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界定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突破、顶尖紧缺人才培养、国家与经济安全等核心领域，对国家抢占国际竞争优势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指导作用的学科。

日韩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的主要原则

对日韩相关政策性文件的分析表明，国际安全治理形势严峻、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全球技术竞争加剧、人口危机逐步升级、生态破坏与自然灾害频发、新兴战略产业发展迟滞等是两国在推进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和规划布局相应学科人才培养时均提及的重要背景和关键动因。在推进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过程中，既要回应上述背景和动因，又要兼顾各自国情与发展布局。对日韩调整优化战略性学科的主要原则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其调整优化的内在逻辑。

1. 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根本遵循

日本《第六次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和《综合创新战略（2024）》强调，尖端重要技术领域作为国家优先支持、对经济安全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关键意义的重要领域，需直面国家在经济发展、安全保障及社会问题解决等方面的紧迫需求。基于此，日本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半导体、新材料、生物技术、聚变能源、医药健康等关键领域作为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的重点。^[3]另外，针对劳动力短缺和灾害频发等国内紧迫问题，日本强调在机器人技术、灾害应对技术及绿色能源等重要学科领域加大投入。

韩国将成为全球技术先导国家作为发展愿景，并指出尖端战略产业的竞争力及尖端战略产业相关学科的人才培养是决定发展成败的关键。同时，从国家政策一贯性、战略布局紧迫性、国际标准契合性等角度综合考量，韩国将半导体、显示器、二次电池和生物技术确定为尖端战略产业，并计划将具备高发展可能性的未来汽车、机器人、国防、核电等纳入尖端战略产业。与国家尖端战略产业发展相匹配，韩国将航空/宇宙/未来出行、生物健康、尖端元

件/材料(半导体、电池等)、数字、环境/能源确定为战略性学科领域,共涉及22项新技术。

2.以凸显前瞻性与融合性为关键导向

一方面,作为引领国家未来发展并为其提供关键支撑的战略性学科必须体现高度前瞻性,精准预测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例如,日本强调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要与“社会5.0”建设、数字化转型、绿色发展等远景目标高度契合,构建能够有效应对因人类活动迅速扩张而引发的大规模危机的智慧体系。另一方面,在新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针对单一学科领域的集中资源投入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科技与社会发展需求,跨学科与多学科领域融合已成为突破性创新的主导趋势。例如,韩国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发展所共同需求的重要技术和未来发展布局所需的新技术为依据,构建“技术群”,以此为依托对“产业群”进行再分类和结构化调整,从中央、地方、大学三重维度调整优化战略性学科,围绕“技术群”和“产业群”作出积极响应和主动布局。

3.以因地制宜合理配置资源为重要前提

当前日韩均面临严重的地方发展危机,故其在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区域特色的挖掘与合理的资源配置,承担“地方创生”和推动区域间均衡发展的责任。

日本《综合创新战略(2024)》特别提到,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源条件,以学科布局优化推动地方发展。例如,东京、大阪等科技资源高度集中的大都市通过构建创新集群,着力推动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学科的发展;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在劳动力流失和产业衰退趋势下,通过发展有利于地方良性循环、绿色发展的特色学科及有雄厚产业积累的学科实现区域经济再生。韩国通过“区域创新体系和教育”(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 Education, RISE)以及“全球本土化大学”(Glocal University 30)两项计划,采取“选择与集中”的支持方式,聚焦与地方发展战略紧密衔接的学科给予专项财政资助,将地方大学建为区域创新中心,推动地方发展。

日韩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的支持策略

日韩两国在相关政策性文件中均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的战略性学科领域,并通过制定出台相应的发展计划与实施方案等为战略性学科的调整优化与发展提供支持。在具体的支持策略上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强化国家政策支持，完善顶层设计

日韩两国通过立法及制定出台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与实施方案的方式为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提供制度保障，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与财政投入提供集中支持。

第一，为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提供制度保障。日本通过连续发布“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综合创新战略”及《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为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提供明确参照；韩国则通过颁布《国家尖端战略产业法》及多个专门的发展规划与实施方案精准布局战略性学科的建设路径。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助于各级参与主体明晰职责。例如，韩国在《尖端领域人才培养战略》中明确指出，中央层面负责构建五大核心领域人才培养体系，包括：设定集中力量重点推进的学科领域、建立官民共治体系、巩固人才培养框架以及开发人才管理与使用的数据系统；地方层面负责建成区域主导的人才培养平台，构建以区域创新为中心的大学支持体系；大学层面负责提高教育—研究—训练的衔接性与开放性，包括：改善僵硬的管理体制并扩大大学自主性、灵活引进和培养研究人员、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以及夯实终身/职业教育训练。完善的制度保障还能够为战略性学科的具体落实提供指导[4]。

第二，优化资源配置与财政支持。日本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向战略性学科倾斜，确保大学在相关学科领域获得充分支持。日本 2022 年 5 月颁布《国际卓越研究大学法》，设立 10 万亿日元大学基金，支持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建设[5]。2024 年，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文部科学省当年 9067 亿日元的追加预算案，以推动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的发展。此次预算调整重点包括基础研究国际化、医学研究支持、大型科研设施建设、尖端技术研发、空间和海洋探索等领域。同时，针对地方高校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与发展提供专项支持。例如，东北大学在半导体技术领域获得地方政府专项资金，用于研发高效能材料及提升芯片制造工艺。韩国对尖端战略产业及相关学科领域人才培养同步予以资源配置与财政支持上的倾斜。以《第一次国家尖端战略产业培育基本计划（2023—2027 年）》重点覆盖的 4 个尖端战略产业为例，韩国计划至 2027 年总计投入 550 万亿韩元[6]。与此同时，涉及到具体相关学科的建设与人才培养，韩国强调要发挥好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以半导体领域为例，韩国通过出台《第四阶段 BK21 项目基本计划》《半导体领域人才培养方案》《尖端领域人才培养战略》等政策性文件统筹推进半导体学科领域的建设与各层次人才培养。

2. 优化战略性学科生态体系，积极推动科技创新

日韩两国通过完善战略性学科体系建设、推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加强产学研有效衔接

与合作等举措优化战略性学科生态,引领科研创新取得重大突破。

第一,完善战略性学科体系建设,夯实学科发展基础。完善学科体系是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战略性学科良性发展的基本保证。首先,从国家层面制定各战略性学科的发展规划与人才培养方案。以韩国为例,2022—2023年先后发布了《尖端领域人才培养战略》及各个战略性学科的人才培养方案,重点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对所涉学科的人才培养层次、师资配备、课程设置、内外部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布局规划。其次,从大学层面加强战略性学科的建设力度。例如,支持大学设立特色研究中心、从制度层面赋予学科管理(包括人员聘用、招生计划、教学时长、课程设置等方面)更多灵活性、增加对研究人员的支持力度(包括为新人研究人员提供稳定研究经费支持、增加科研奖励额度、为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研究提供特别资助等)。最后,从具体学科层面探索改革创新的方向与举措。例如,东京工业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探索新型课程体系建设,其新设的“人工智能工程伦理”课程,将技术训练与社会责任教育相结合,既满足了新兴产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又引领了学科的规范化发展等。

第二,推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形成新的学科优势。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是战略性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生成新学科优势的关键前提。例如,在医药健康领域,日本京都大学精准医学研究中心通过整合生物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资源与技术,针对癌症等难以攻克的疾病开发个性化治疗方案,产生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优势;在半导体领域,韩国高丽大学2019年开始参与国家推进的“产业人工智能专业人员培养项目”,整合人工智能、工业制造以及相关学科专业的人员与资源,集中攻克半导体领域中的质量预测、设备预知保全、生产流程优化等难题,为韩国半导体生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持。

第三,加强产学研有效衔接与合作,打造战略性科技高地。产学研有效衔接与合作是战略性学科发展的根本依托,与国家战略产业发展互促共荣。从服务国家战略产业发展和尖端领域人才培养角度出发,韩国正致力于打造“高科技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系统”(High HRD Ecosystem),旨在进一步强化政府、企业与教育/培训机构之间的衔接与合作。同时,通过实施尖端产业人才培养训练营项目、建设尖端战略产业园区、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尖端领域人才培养等措施,助力产学研深度融合。2024年9月,日本综合创新战略推进会议确定了全球初创企业园区(GSC)构想的基本方针,提出在东京目黑区设立旗舰基地,打造全球化创新孵化平台。该基地采取政府主导下的产学研协同联动共建模式,支持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气候变化等重要科技领域的研发。在此基础上,大学也积极寻求与企业的深度合作,

打造战略性学科发展的生态闭环。例如，在聚变能源领域，日本京都大学与大型能源企业合作开发高能量反应堆项目，既推动了该领域技术的创新发展，又为学科建设补充了充足的研发经费，紧密的产学研衔接与合作极大地优化了战略性学科建设。

3.深化国际协作，培养“全球本土化”尖端人才

国际协作是日韩两国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的重要推动力。日本在《第六次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中指出，通过优化国际协作与协调机制，加强自由竞争格局下的国内体制改革与前沿科技领域的开拓能力建设，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方向。韩国在《尖端领域人才培养战略》及相关战略性学科人才培养方案中也强调，为国际人才留用、国际化人才培养及高水平国际合作提供支持。

日韩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注重引入和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日本东京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立量子计算与信息联合伙伴关系，通过技术与经验共享，在量子计算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韩国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国内研究团队与海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例如，2023 年仅通过人才互通项目（Brain Link）就投入了 100 亿韩元。另外，日韩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注重留用国际人才和培养国际化人才。例如，在生物技术领域，东京医科大学通过国际课程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并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国学生。韩国通过引育留用国际尖端人才、支持国内外人才交流与合作研究等方式提高韩国在战略性学科领域的技术竞争力并强化“全球本土化”人才培养，包括：聘请海外顶尖研究人员，为其提供长达 10 年的各方面支持；开展富布赖特尖端技术领域奖学金项目，支持韩国学生赴美攻读尖端技术领域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支持美国尖端技术领域研究人员在韩国大学开展研究；扩大硕、博士层次战略技术人才交流，在量子、生物、宇宙等重点战略领域，派遣硕、博士层次人才开展合作研究，并支持参与委托教育课程等[7]。

对我国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的思考与建议

参考日韩相关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及国家对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调整优化的整体布局，对推进新发展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提出如下思考与建议。

确立调整优化基本原则，凝聚战略性学科建设共识。以韩国为例，其在《尖端领域人才培养战略》中系统呈现了五大战略性学科领域设定的逻辑过程，在对尖端产业/新技术相关政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三个阶段对政策一贯性、人才需求度、产业分类发展预测予以论证，最终确定当前急需集中力量重点推进的五大战略性学科领域。2020 年 8 月，我国教育

部提出建设“四新”学科,即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旨在聚焦科技前沿和国家关键战略领域,布局新兴专业,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随后,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进入密集调整优化阶段。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相关数据,2024年新增1673个国家战略急需专业布点,撤销1670个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布点。可以说,我国在大力推进高等教育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方面已达成高度共识,对战略性学科的内涵也有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但需进一步明确调整优化的基本原则,形成更为清晰的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路线图,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领域、分重点、分层次锚定具体战略性学科领域予以大力推进。

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加强战略性学科系统部署。通过立法及出台一系列指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战略规划等方式,为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提供制度保障。同时,构建具有前瞻性、融合性与灵活性的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机制。所谓前瞻性,是要精准预判国家重大战略转向、前沿科技进展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所谓融合性,是要凸显区域间、机构间、学科间的深度交叉融合,实现基于深度协作的超学科发展;所谓灵活性,是要充分展现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的动态属性,及时与国家需求变化保持同步。

强化多主体协同治理,打造战略性学科生态体系。战略性学科调整优化是牵涉多方利益主体的专业性与复杂性极高的整体工程,构建良性循环的战略性学科生态体系需要统筹协调政府、企业(产业界)及高等教育机构三者之间的协同治理[8]。其中,在政府层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工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夯实基础,包括推动不同政策制度间的有效衔接、构建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完善教育/科研/实训衔接体制、强化产学研合作机制、实施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动态监测等;在企业(产业界)层面,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着力以人才培养引领技术创新,包括积极参与战略性学科人才培养、共享人才需求相关信息、在产学研合作中发挥好衔接作用等;在高等教育机构层面,以人才培养为载体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式成长,包括设置线上线下多样化的教育项目、支持超学科融合纵深发展、共享人才培养相关信息等。通过多主体协同治理,构筑具有良性循环能力的高科技战略性学科生态体系。

探索国际化新路径,形成战略性学科发展合力。在尖端产业领域制裁升级和尖端技术封锁成为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在战略性学科国际化发展上需探索出有别于日韩经验的新路径。一是顺应全球南方力量崛起的历史大趋势和“三大全球倡议”的核心要义,着力推动同全球南方国家战略性合作关系的构建,为战略性学科的优化与发展创设新路径;二是坚持尖端技术自主创新及尖端人才引育留用基本路线的同时,参考韩国“积极吸引东盟优秀人才进

入国内一流大学学习并为其提供就业平台支持”的做法，为战略性学科的优化与发展开拓国内外人才交流和合作研究新空间；三是深挖中外合作办学资源，尤其是具备良好发展前景的顶尖中外合作大学，为战略性学科的优化与发展提供新可能。

参考文献：

[1][日]内阁府.综合创新战略 2024[R].内阁府，2024.

[2][韩]产业通商资源部.国家尖端战略产业竞争力提升及保护特别措施法[Z].产业通商资源部，2025.

[3][日]内阁府.第六次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2021年3月26日内阁会议决定）[R].内阁府，2021.

[4][韩]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协同.尖端领域人才培养战略[R].教育部，2023.

[5][日]文部科学省.《国际卓越研究大学法》基本方针[R].文部科学省，2022.

[6][韩]产业通商资源部.第一次国家尖端战略产业培育基本计划（2023—2027年）[R].产业通商资源部，2023.

[7][韩]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协同.理工科人才支持方案[R].教育部，2023.

[8]包水梅，陈秋萍.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学科设置调整机制的基本逻辑[J].中国高等教育，2024（18）.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研究”（项目编号：22JJD880006）的研究成果]

（《中国高等教育》2025年第8期）

美国一流大学应对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的改革行动与反思 | 邢园园 钱玲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及其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正深刻影响美国高等教育。本文基于对美国35所一流大学人工智能应用指南的系统分析，探讨美国大学在教学领域的改革行动。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契机，美国一流大学采取三方面的行动：重新定义学术诚

信,规范生成式内容的引用格式,更新检测手段,维护学术规范;改革师生沟通机制,明确人工智能使用边界,发展学生关键技能,公开使用政策;采取人工智能赋能的评估反思框架,强化多样化教学评估方式,开展真实情境评估、动态阶段评估、多模态评估和重启课堂评估,注重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等高阶能力。我国一流大学应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塑造学术诚信的新环境,提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积极推动教育评价转型。

关键词: 人工智能;教学改革;一流大学;师生沟通

一、改革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人类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方式与效率正经历深刻变革。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生已广泛采用人工智能工具辅助信息处理、完善文档内容,甚至直接寻求问题答案。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与教育机构也在积极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并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规范。

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已显著影响高校的教学实践、学生学习过程和评估体系。其中,教学模式的变革、评估体系的重构成为受人工智能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尤其是如何应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和教师判断学生作业中人工智能的参与度等问题,引发广泛讨论(UNESCO, 2023a)。然而,许多高校在人工智能的科学使用和学术诚信的界定上仍缺乏清晰的政策指引,或政策制定滞后。

2023年以来,以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世界一流大学敏锐意识到人工智能对教学的潜在影响,率先采取行动,发布人工智能应用指南。这些指南提供的指导建议包括教学评价的基本原则、教学评估改革策略和教学大纲模板,帮助师生科学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美国其他一流大学也迅速跟进,在2023—2024年间相继出台适合自身需求的人工智能应用政策。系列应用指南的出台,引领着人工智能时代美国一流大学的教学创新。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聚焦美国一流大学在教学与评估领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决策行动,探讨其值得借鉴的经验。

二、样本选择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24年美国最佳综合大学排名(U.S. News, 2024),本研究选取综合排名前50的大学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使用“AI policy”“Generative AI policy”“AI guidelines”“Generative AI guidelines”“AI guide”“Generative AI guide”等关键词搜索美

国大学官方网站生成式人工智能评估指导文件、政策或指南。此外，为确保收集信息的全面性，研究者还查看了各大学官方网站可能包含生成式人工智能政策的专栏（如教学中心、信息技术部门）。

经筛选，35所大学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和政策文件，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列出前十所大学（见表1）。这些政策文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大学教务长办公室、首席信息官办公室等管理部门发布的政策型文件，其内容相对简洁，旨在为大学的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指导；另一类是由大学的功能性部门发布的指导性文件，其内容相对具体，包含教学大纲示例、人工智能工具使用、人工智能资源支持等。为确保研究的全面性，本研究未严格区分指南的类型，以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表1 十所一流大学人工智能指南列表及数据来源(示例)

序号	学校	标题	网址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主要内容
1	普林斯顿大学	人工智能工具指导	https://mcgraw.princeton.edu/guidance-ai-chatgpt	教学中心	2023.1	提供改革指导建议,包括明确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政策、解释教学理由、重新设计教学评价活动以及阐述人工智能的局限和潜力,提供人工智能教学大纲陈述样本。
2	麻省理工学院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使用入门	https://ist.mit.edu/ai-guidance	信息技术部门	2024.4	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指导,强调信息安全、隐私保护、合规性等,建议教师咨询后使用,保护信息,确保人工智能信息的准确性,并报告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情况。
3	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初步指南	https://hut.harvard.edu/ai-guidelines	信息技术部门	2023.7	列举人工智能工具应用注意事项,包括信息安全和数据隐私、合规性、版权和学术诚信,给出教学改革建议。
4	斯坦福大学	生成式人工智能政策指导	https://communitystandards.stanford.edu/generative-ai-policy-guidance	社区标准办公室	2023.2	行为事务委员会制定指导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课程使用政策,要求学生承认并报告使用情况,教师可自行确定并在大纲中明确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政策。行为事务委员会将持续关注工具发展,鼓励反馈,并建议教师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检测软件。
5	耶鲁大学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指南	https://provost.yale.edu/news/guidelines-use-generative-ai-tools	教务长办公室	2023.9	鼓励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但强调需遵守安全、学术诚信和数据保护准则,包括避免共享敏感信息、审查人工智能输出的准确性,并注意网络安全。
6	宾夕法尼亚大学	关于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指导声明	https://www.isc.upenn.edu/secturity/AI-guidance	信息技术部门	2023.10	鼓励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强调需遵守安全、学术诚信和数据保护等准则;提供教育工作者指南、学生指南、研究者指南、常见人工智能问题指导等改革建议。
7	加州理工学院	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型语言模型工具使用指导	https://www.caltech.edu/campus-life-events/campus-announcements/guidance-on-the-use-of-generative-ai-and-large-language-model-tools	教务长办公室	2023.10	鼓励负责任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型语言模型,强调披露、数据保护、内容责任和荣誉准则,以促进透明度、完整性、隐私保护、准确性和公平性。
8	杜克大学	杜克大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学	https://ile.duke.edu/ai-and-teaching-at-duke-2/	学习创新与终身教育中心	2024.8	指出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人工智能的缺点,及其可能提供的教学改革机会;强调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提供课程策略建议和建议使用人工智能检测软件。
9	布朗大学	人工智能对学术使命的潜在影响	https://www.brown.edu/about/administration/provost/communications/potential-impact-ai-our-academic-mission	教务长办公室	2023.8	强调高等教育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道德敏感问题;提供人工智能指南、学术诚信规定、引用标准、数据保护准则、研究工具使用和知识产权等资源。
10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ChatGPT时代的教学与学习	https://engineering.jhu.edu/cmt/s/chatgpt/	媒体技术部门	未注明	提出人工智能工具使用和学术诚信的指导方针、倡导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政策建议,以及教师如何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改革教学评估策略。

三、主要内容

基于对人工智能政策指南的分析,本研究发现美国一流大学的改革行动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重新定义高等教育的学术诚信、优化师生沟通机制和改革教学评估方式。

(一) 重新定义学术诚信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学术诚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成为教学改革的核心

议题之一。学术诚信不仅是教育评估的道德基石,也是确保评价结果公平性与有效性的关键。美国一流大学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将重新定义学术诚信视为重要改革方向。这些指南详细阐述了对抄袭与剽窃的界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使用规范和检测方法等。不同大学依据自身需求采取了多种举措,确保教学评价的持续性和可信性。

1. 重新界定抄袭及其判定标准

禁止抄袭是美国大学教学评价政策最基本且严格执行的规定,各校针对抄袭的判定标准有明确规定。抄袭是个多维概念,有不同的解释和定义。常见形式之一是“文本抄袭”,即“在没有适当归属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的文字或思想”,这种行为可能是故意的“直接抄袭”,也可能是无意的“补丁写作”(Pecorari & Petrić, 2014)。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抄袭的判定标准也有待所补充和扩展。

布朗大学规定“提交抄袭的论文、其他书面或口头材料,或故意将他人的思想、语言、观点、表达、经历及人工智能平台、技术或算法的实质性内容或输出,歪曲为自己原创的作品”即为抄袭(Brown University, n.d.)。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经常生成不正确的陈述、虚假来源或不正确的信息来源。有高校认为未确认材料来源和正确性就引用也构成抄袭(Harvard University, 2023a; Princeton University, n.d.)。杜克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指南指出,学生可以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作为灵感来源,但如果没有正确引用或确认来源,将被视为抄袭(Duke University, 2024a;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23)。未经教师许可,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作为自己的作品提交,也被视为学术不端行为(Northwestern University, n.d.)。

2. 规范生成式内容的引用格式

对于是否以及如何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美国一流大学普遍将权力下放,即由教师自主决定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规则。²⁵ 所一流大学的指南明确要求教师在课程大纲中阐明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态度和要求。若教师允许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则需明确引用规范。学生应根据教师的指导说明引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未能恰当引用或说明生成式工具的使用,会被视为违反学术诚信政策(Dartmouth College, 2023)。

多所院校基于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格式、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LA)格式和芝加哥(Chicago)格式,提供新的引用格式。学生需要在作业中记录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全过程,详细说明所

用工具、访问日期、使用目的和提示语。任何超出允许范围的行为,都可能构成学术诚信违规(Northwestern University, n.d.-b; Harvard University, 2023b)。例如,杜克大学的范例为:

“本课程所有提交作品必须是原创,如使用他人的观点和作品(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资源),必须引用”(Duke University, 2024b)。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教学大纲以设计类课程为例指出:“在实际工作中,设计师通常会使用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工具。因此,本课程允许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工具,但必须遵守以下规定:1)必须说明使用了何种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工具、使用日期,并采用 MLA 格式;2)重点描述所用示例及其转换过程,展示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或内容应采用 MLA 格式”(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n.d.-a)。普林斯顿大学强调,学生必须对自己的作品负责,规范引用所有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内容(Princeton University, 2023)。布朗大学为学生提供的引用示例见表 2(Brown University, 2024)。

表 2 布朗大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引用格式要求

	APA 格式	MLA 格式	芝加哥格式
一般 准则	文中直接引用此内容时,应在参考文献列表列出文本引用和关联条目。如果某些部分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应在引言或方法部分描述用途,以及使用的提示语。	采用人工智能工具输出的内容需引用,包括直接引用、图像、数据及释义内容。如果将人工智能工具用于其他目的,如翻译、编辑或生成大纲,请在文中注明。如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无作者来源,标题应是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简要描述。如果创建可共享链接,不能仅提供域名网址,而应在引用中包含具体链接。	将人工智能工具视为作者。如果可能,描述生成文本内容的提示语,也可将该信息标注在脚注或尾注。引用日期为内容生成的日期。
格式	Author. (Date). Name of tool (Version of tool) [Large language model]. URL.	"Description of chat" prompt. Name of AI tool, version of AI tool, Company, Date of chat, URL.	Author, Title, Publisher, Date url for the tool.
示例	OpenAI. (2023). ChatGPT (Mar 14 version) [Large language model]. https://chat.openai.com/chat	"Examples of harm reduction initiatives" prompt. ChatGPT, 23 Mar. version, OpenAI, 4 Mar. 2023, chat.openai.com/chat.	Text generated by ChatGPT, OpenAI, March 7, 2023, https://chat.openai.com/chat . ChatGPT, response to "Explain how to make pizza dough from common household ingredients," OpenAI, March 7, 2023, https://chat.openai.com/chat .
文内引 用示例	(OpenAI, 2023)	("Examples of harm reduction")	(ChatGPT, March 7, 2023)

3. 更新人工智能内容检测手段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学生使用这些工具已不可避免。尽管各院校对待人工智能检测工具的态度不尽相同,但一流大学尽量提供系列方法帮助教师辨别学生作业内容的真实性与原创性。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指南指出,目前并没有一种完美的方法可以准确检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情况,然而一些“危险信号”提示学生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以下是可能帮助教师识别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策略(Vanderbilt University, n.d.):

- 不准确的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常生成不准确的信息。因此,如果作业存在明显错误或不准确的文本,可能表明学生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
- 不明确的方法:如果作业中使用的方法与课堂介绍的明显不同,且没有引用外部来源信息,这表明它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

- 查看不同语气: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通常较为公式化,缺乏人类写作的情感深度。如果文本读起来像机器生成的,这可能是个提示信号。

- 与以前作业对比:如果学生的语气和写作风格与之前有显著差别,可能表明他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

- 评估引文:人工智能工具可能引用学生难以获取的学术资源,或生成虚假的文献资料,需谨慎辨别。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类声称能够准确识别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检测工具相继出现。然而,不同高校对检测工具的应用策略和认可程度存在差异。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九所高校的指南指出,教师可以使用抄袭检测软件(如Turnitin、GPTZero、Copyleaks、Originality AI等)辅助检查,但要谨慎。这些工具有助于识别包含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文本,从而为教师提供调查依据并采取适当措施(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n.d.)。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速度远超检测工具的更新速度,目前尚无任何检测软件能准确识别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University of Michigan - Ann Arbor, 2023)。研究表明,不同检测工具的准确性差异较大,可能出现漏判和误判(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n.d.; Columbia University, n.d.)。因此,人工智能检测工具应被视为辅助手段,而非最终判定标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建议,若使用人工智能检测工具,教师应至少采用两种不同工具并对比分析,以提高判断的可靠性(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2023)。

然而,杜克大学、南加州大学等七所高校不推荐或明确禁止使用人工智能检测工具。除了检测工具的准确性,这些高校还关注使用检测工具可能导致的学生隐私泄露问题。特别是学生作品上传到检测系统,原创内容被人工智能检测工具读取和学习,可能引发数据安全和版权争议。因此,这些高校建议,不能单纯依赖检测工具,需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明确人工智能使用规范,提供多样化的教学评估方式,以有效维护学术诚信。

(二) 优化师生沟通机制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生成内容质量的不断提升,师生对其认知与态度日趋多元。学生普遍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学习效率并优化作业质量,教师则关注其广泛使用是否会增加学术不端行为的风险,并积极探索如何有效地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教学,以提升教育质量。在此背景下,师生间的有效沟通成为改革行动的关键。美国一流大学通过优化师生沟通机制,鼓励师生深入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明确

课程要求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政策，同时强调学术诚信与原创性原则，帮助师生全面理解和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 明确人工智能使用边界

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边界是师生沟通的关键，有助于学生理解人工智能工具在学习过程中的合理应用场景及其局限。清晰的使用规范有助于维护学术诚信，确保评估的公平性。美国一流大学的指南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合理应用能有效地支持学和教。例如，在创意写作和科学研究设计中，学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获取灵感并辅助数据分析（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n.d.-b）。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还能提升学习效率，帮助学生撰写论文初稿、检查语法和优化文本，从而将更多精力投入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和创造性思维等高阶思维活动（Brown University, n.d.）。

为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范使用，教师应在课程开始前明确说明哪些任务允许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并提供适当指导（Harvard University, 2023b）。西北大学要求教师提供具体案例，阐明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使用情况，同时教授正确引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方法，并强调未引用或误用的潜在学术后果（Northwestern University, n.d.-a）。普林斯顿大学进一步指出，学生可在头脑风暴和初稿撰写阶段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但最终提交的作品必须独立完成，并严格遵守学术诚信原则（Princeton University, 2023）。

2. 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学生能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不仅应适应技术变革，更应积极将人工智能融入教育实践，以提升学生能力和素养，人工智能的应用应始终以优化和促进学生的学习过程为核心目标。通过支持个性化学习，人工智能能够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与实践技能。合理引导与规范应用将使人工智能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动力，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在引导学生有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时，教师不仅应展示人工智能作为学习工具的潜力，还应帮助学生认识到人工智能在能力提升和适应社会中的重要作用（Vanderbilt University, 2023a）。

为确保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美国一流高校鼓励师生建立开放、持续的对话机制，帮助学生理解人工智能的优势、局限性和伦理问题（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n.d.-b）。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华盛顿大学鼓励通过专题研讨、实践课程和师生共创项目，引导学生合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发展技术素养与批判性思维（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2023）。哈佛大学提供明确的政策与指导，鼓励学生在学术诚信框架下，充分发挥人工智能

的潜力，实现深度学习与全面发展（Harvard University, 2023a）。华盛顿大学鼓励学生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发展关键技能并为未来的职业生涯作好充分准备（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n.d.）。

3. 鼓励公开人工智能使用政策

美国一流大学要求教师在课程开始前必须清晰地告知学生人工智能使用政策。通常，人工智能使用政策分三类：禁止使用、有限使用和开放使用（Harvard University, 2023a）。西北大学提供了人工智能使用政策模板（Northwestern University, n.d.-b），帮助教师制定清晰的课程政策。

1) 禁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严格禁止在课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任何与课程相关的材料或内容。任何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行为都将被视为潜在的学术诚信违规。

2) 有条件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学生只能在作业中按照规定的目的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且必须在提交作业时详细说明人工智能使用情况，包括使用目的、工具和提示语。任何超出允许范围的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学术不端。

3) 开放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学生可以自由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但需在作业中清晰说明使用目的、工具和提示语。

此外，课程中是否允许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书面政策应至少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范围及相关政策，与人工智能使用相关的评分政策及其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确保学生了解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是否会影响评分标准。

范德比尔特大学制定的政策框架要求教师与学生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政策前，先清晰回答以下问题，以便明确表达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要求和期望（Vanderbilt University, 2023b）：

- 是否允许在课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 对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生有何期望？学生可以用这些工具完成哪些任务？是否可以用于头脑风暴、校对或撰写文本？
- 如何界定恰当与有道德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 课程中，哪些行为属于与人工智能使用相关的学术不端？

- 如何确保学生了解并遵守保密和隐私政策?

总之,美国一流大学在课程中是否允许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及使用方式上,赋予教师决策权,且教师可与学生协商决定,关键在于明确公开课程人工智能使用政策,清晰表达教师对人工智能使用的立场与期望,提高人工智能教学应用效率。

(三) 改革教学评估方式

整体上,美国一流大学采取积极的态度,提出一系列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评估方式改革行动建议,如反思现有教学评价方式,设计基于真实情境的评估活动,采用分阶段动态评估、多模态评估,以及重启课堂评估。这些改革行动旨在避免学生因依赖人工智能而导致评估失效,进而鼓励教师积极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拥抱教学评价创新,推动教学评价变革,为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创造新的可能。

1. 人工智能赋能的评估反思框架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许多一流大学积极推动教学改革,鼓励教师重新审视和优化传统评估方式,确保评估活动在人工智能环境下仍能有效促进学生学习。例如,波士顿学院倡导教师采用布拉夫(Bruff, 2023)反思框架(见图1),为教学评估设计提供系统化指导,帮助教师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同时抓住其带来的教育创新机遇(Boston College,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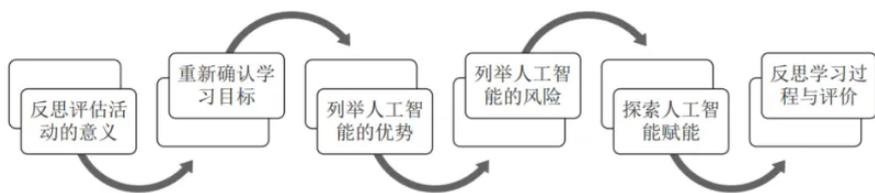


图1 人工智能赋能下教学评估设计反思框架

1) 反思评估的意义。教师需重新审视评估活动能否精准衡量学生应掌握的核心知识与技能。例如,不少教师之前要求学生期末提交一篇综合论文,当前应重新审视其与课程目标的契合度,同时提供个性化选择空间。教师可以允许学生根据兴趣或背景选择论文主题。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参与度,还能激发其创造力,促使学生在更具自主性的学习环境中深入探索。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教师需持续反思和调整评估活动的意义,确保教学目标与社会需求同步更新,促进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发展。

2) 重新确认学习目标。评估设计的首要目的是支持学生达成学习目标。然而,实际教

学中,评估可能偏离既定目标。教师需定期审查作业设计与学习目标的契合度,并结合人工智能的应用背景,动态调整教学目标。这种持续反思和调整过程能够保障评估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学生在技术变革背景下达成学习目标。

3) 列举人工智能的优势。教师应系统梳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对学生学习的潜在优势。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支持学生生成初稿、改进语言表达或提供写作灵感。通过明确优势,教师能够设计更具建设性的评估任务,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教育赋能效应。

4) 列举人工智能的风险。如使用不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削弱学生的写作和逻辑思维等关键能力。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难以获取的资源(如基于特定馆藏的研究成果分析指定文本)设计学习活动。此外,教师还应引导学生识别和评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与适用性,帮助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

5) 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可结合具体场景设计创新型评估活动。例如,西北大学采用“生成与评价结合”的任务设计: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特定主题的初稿后,评估内容质量,修订文本,验证引用真实性,并撰写对生成内容的评价(Northwestern University, n.d.-b)。这种任务设计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批判性分析能力,还强化了学术诚信意识,为人工智能融入教学提供了路径。

6) 反思学习过程与评价。动态反思学习过程是确保评估具有意义的关键策略。哈佛大学要求学生分析和标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与原创内容进行对比并讨论差异(Harvard University, 2023a)。这种方式将评估从衡量单纯的学习成果转向对学习过程的深入理解,促进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发展。通过实时反馈与支持,教师能够帮助学生认识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和潜在价值,提高学习成效。

总之,美国一流大学鼓励教师通过反思与优化教学评价活动,积极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教育变革。人工智能赋能的多样化教学评估,如真实情境评估、动态阶段评估、多模态评估和重启课堂评估,都可以在这一反思框架下得到扩展。

2. 人工智能赋能真实情境评估

美国一流大学鼓励采用人工智能赋能真实情境评估,旨在通过贴近现实世界的任务设计,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与学习成效。这种评估方式将人工智能工具整合于实际问题解决过程,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与传统评估相比,真实情境评估不仅强调学习成果,更

关注学生在动态环境的分析、决策和创新能力（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n.d.）。

1) 乔治华盛顿大学：结合课堂内容与实际经验

基于特定情境的评估设计被广泛认为是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挑战的重要策略。乔治华盛顿大学建议教师设计评价活动时，要求学生结合课堂知识、讨论内容与生活经验，如深入分析课堂使用的图像、视频和其他媒体材料，这是人工智能工具难以直接生成的满足任务要求（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23）。这种设计能鼓励学生在特定情境展开批判性思考，并通过创造性方式展示学习成果。

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基于真实问题的应用任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强调评价活动应以解决实际问题或创造新知识为目标。基于真实问题的任务需要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复杂、开放性问题。这常需要高阶思维技能的参与。这种方法能显著减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更真实地反映学生学习成果（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n.d.）。

3) 耶鲁大学：利用专属资源与未解决问题

耶鲁大学建议教师在设计评价任务时，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难以访问的资源，如付费数据库、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鼓励学生探讨尚未解决或刚刚开始研究的问题，从而引导他们发挥创造性。这些策略既提升了学习任务的挑战性，也突出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人工智能工具还能提供即时反馈和数据分析支持，帮助学生深化理解学习内容，培养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Yale University, 2024）。

4) 密歇根大学与康奈尔大学：创造性和个性化方式展示学习成果

美国一流大学的评价策略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等高阶思维。传统的评估方式，如闭卷考试和论文写作，往往偏重于对知识记忆和理解的测试。密歇根大学倡导通过设置解决实际问题或模拟真实情境的任务，鼓励学生以创新方式运用学科理论与方法解决问题（University of Michigan - Ann Arbor, n.d.）。康奈尔大学强调设计基于真实情境的任务，鼓励学生通过创造性和个性化方式展示学习成果（Cornell University, n.d.）。

综上所述，通过真实情境评估，大学能更全面地衡量学生的实际能力，并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因此，教师需要重新审视评价目标与方法，从探究式学习、问题导向学习、情境化学习、项目式学习等教学模式中汲取经验，并结合课程实际，灵活构建更具

真实性和挑战性的评价活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2023)。

3. 人工智能赋能的动态阶段评估

动态阶段评估的理论基础可追溯至形成性评估理念。该理念强调在学习过程中持续观察和反馈学生表现,不仅关注最终成果,更侧重学生的长期发展与能力提升(Black et al., 2018)。相较传统的结果导向评估,动态阶段评估强调学习的过程性和发展性。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下,其重要性愈发凸显。一方面,动态阶段评估支持教师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度与潜在困难,防止因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工具而影响学习效果。另一方面,该策略通过阶段性任务和反馈机制,促进学生反思能力的发展。为了推动动态阶段评估的有效实施,众多一流大学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与实践方案。

1) 东北大学的中期提交策略

东北大学建议教师在作业设计中引入中期作业提交机制,将学习过程的一部分纳入评价。中期内容可以包括头脑风暴的过程与结果、初步构思、大纲、注释甚至草稿等。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通过教师的及时反馈,帮助学生调整方向并改进作业内容(Northeastern University, 2023)。中期作业不仅能够为教师提供深入了解学生思维发展路径的机会,还能为学生提供及时指导与支持。

2)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分阶段评价模式

宾夕法尼亚大学提出分阶段评价的策略,允许学生在不同阶段提交作业。通过分阶段提交作业,学生能够在不同阶段获得针对性反馈,教师也能更全面地掌握学生的学习轨迹(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n.d.)。这一方法不仅减轻了学生因落后而产生的焦虑,还能减少因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带来的学术压力。

3) 范德比尔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任务分解策略

范德比尔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倡导教师将复杂的作业拆解为多个小的阶段性任务(Vanderbilt University, n.d.; Cornell University, n.d.)。这一策略通过降低单一任务的复杂度,降低学生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作业的可能性。同时,每个阶段性任务均设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使学生能在结构化学习中逐步掌握核心知识与技能。

动态阶段评估通过强调学习过程的连续性与发展性,要求学生在每个学习阶段主动参与、深入反思与持续改进,从而促进深度学习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相比于静态评估,动态

评估能够更客观地反映学生的真实学习状态,避免因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而影响学习质量。此外,动态评估要求教师在评价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不仅需要设计科学合理的阶段性任务,还需要在每个阶段提供具体且有针对性的反馈,以有效支持学生的学习过程。

4. 人工智能赋能的多模态评估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响下,美国一流大学积极推动多模态评估改革,以更全面地适应学生的多样性特征与个性化表达需求。该模式突破了传统以文本作业和标准化考试为主的评估范式,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展示知识的途径。

1)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多模态作业设计

通过提供多样化作业形式选择,如学术论文、视频制作或信息图表设计,教师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创造性表达,并激发其学习动机。例如,教师可以设计清晰的作业指导,明确学生需展示的核心技能和能力要求,同时避免对作品形式过度限制。这种灵活性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大的自主发挥空间,还能有效降低抄袭或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工具导致的学术不端行为风险。为了确保评估的公平性,卡内基梅隆大学建议教师采用通用评分标准,无论学生选择何种作业形式,均需遵循相同的评价标准,在保障多样化表达的同时,确保评估的客观与公正(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n.d.)。

2) 斯坦福大学与南加州大学的多模态表达实践

尽管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和视频存在局限性,但相较于文本内容,其可识别性更高。因此,斯坦福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倡导在教学评估中采用多模态评估,如视频展示、音频创作、数据可视化等,全面展示学生学习成果(Stanford University, 2023;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24)。这一评估形式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表达渠道,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过度依赖。

3)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海洋学课程的创新任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提供了典型的多模态评估案例(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n.d.)。在海洋学课程中,学生需持续五周记录海洋数据的变化,并以演示文稿形式定期更新分析结果。任务包括:从指定网站获取浮标数据;选择地图投影和时间范围;分析浮标轨迹及相关数据变化;制作创意性的PPT,展示数据分析与创意表达。

为增加任务趣味并增强个性化体验,教师鼓励学生设计拟人化浮标角色,使任务内容更

具创意。学生需根据实时更新的数据，反复提交分析结果并持续完善内容。这种任务设计使学生难以单纯依赖人工智能工具完成作业，可有效培养其数据分析、信息整合和视觉表达能力。

在鼓励采用多模态评估策略的同时，美国一流大学也明确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迅速发展，图像、视频等媒体内容生成能力将不断提升。因此，教学改革措施不仅要着眼于应对当前的技术局限，更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综合多种媒介表达的能力，帮助他们为适应未来复杂的技术环境作好准备。

5. 人工智能赋能的重启课堂评估

传统的评估模式通常要求学生在课外独立完成大部分作业，当前美国一流大学积极调整评估时间，增加课堂评估环节，减少对课外作业的依赖，以降低人工智能工具对学生学习的干扰，确保评估真实地反映学生实际能力。

1)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指导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议，在允许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评估活动中，教师应提供明确的指导和监督，确保学生遵守学术诚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n.d.）。在不允许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情况下，教师可通过增加课堂评估活动，如课堂写作或小组讨论，降低学生对人工智能的依赖，确保学生在受控环境中独立完成任务。

2)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综合实践：课堂写作与协作笔记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提出，让学生在课堂完成短篇手写作业或反思论文，可以提高评估的真实性（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202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采用协作笔记分享与总结的方法，鼓励学生团队合作通过实时笔记反馈学习进度，深化理解（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n.d.）。这些课堂活动有效减少了人工智能生成工具的干扰，使评估更加公正透明，确保学生的知识掌握和思维能力得到真实反映。

3) 塔夫茨大学人工智能辅助的分层学习方法：翻转课堂与协作评估

塔夫茨大学提出人工智能辅助的分层学习模式（AI Marble Layer Cake），将课外时间用于知识获取和练习，课堂时间用于协作、讨论和展示（Cardamone, 2024）。这种基于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有效地将人工智能辅助学习与实时评估相结合，构建能够防范人工智能滥用的教学环境，同时通过分布式学习促进学生长期深度理解。

4)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警示：评估的公平与包容

卡内基·梅隆大学指出，尽管课堂评估方法能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但过度依赖单一形式可能带来新的不公平。例如，定时手写作业可能不利于书写速度慢的学生，口头报告可能给患有焦虑症学生带来压力（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n.d.）。因此，该校建议结合多种评估方法，并为学生提供必要支持，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与包容，确保评估符合教学目标并能准确反映学生实际能力。

总之，美国一流大学倡导多种评估方式，既包括课内的实时评估，又包括课外的综合任务。通过提供适当支持、明确评估标准、设计灵活的提交形式和反馈机制，教师可以提升评估的公平和包容性。这种多样化的动态评估方法，不仅能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还能为学生创造更加真实和支持的学习环境。

四、总结与反思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美国一流大学迅速作出回应，明确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立场，并制定了具体规范，包括重新界定抄袭定义，调整引用格式，更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检测手段等。这些举措构成了美国一流大学应用人工智能推动教学改革的首步行动。

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尤其是由新技术驱动的结构变革，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更需要深入教学实践各个环节，以确保改革的一致性和可持续性。从美国一流大学的实践看，他们并未采取单一的政策支持或抵制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而是强调师生之间的充分沟通，并将互动协商作为政策实施的重要原则。一方面，大学将人工智能使用的决定权下放至学院或教师，使政策能够根据课程需求灵活调整。另一方面，大学鼓励师生在课程初始阶段讨论并共同确定人工智能的使用范围和边界。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沟通机制，使学校、教师和学生能在动态平衡中找到技术应用的最佳实践路径，为未来技术的发展提供持续支持。这些教学改革的核心目的不只是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在于提升师生的人工智能素养，促进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人工智能赋能的多元评估方式与教学策略，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为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 DeepSeek 等为代表的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并跻身世界前列。我国高等教育如何利用这一时代机遇，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已成为亟待探讨的重要议题。从美国一流大学的经验看，技术的迅猛发展始终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但不应成为改革的核心。

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应以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为根本目标。因此,无论是教学模式的创新,还是人工智能工具的实践应用,其最终导向都应聚焦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在此过程中,教育改革应尊重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为其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支持,增强技术素养,推动教学方法的创新。只有在保障教师自主性的基础上,构建科学合理的技术应用框架,才能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助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速度已不再以年为单位,而是以月甚至日为单位。这一动态变化特性使得研究结论面临一定的时效性限制,需要结合最新技术发展持续更新。例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部分美国一流大学已与相关技术提供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构建本地化的人工智能服务平台,以规避利用人工智能学习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版权归属问题。例如,哈佛大学通过与多个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合作,推出人工智能沙盘(AI Sandbox)(Harvard, 2025),为师生提供安全的探索环境,降低数据和隐私泄露的风险,并确保输入的数据不会用于训练任何供应商的大语言模型。这一趋势表明,美国在人工智能应用与教育改革方面的探索仍在持续推进。

我国一流大学应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发挥在全球高等教育变革中的引领作用,积极探索并实践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只有通过实践与行动,才能推动自身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为其他高校提供参考,共同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在技术变革时代中的持续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开放教育研究》2025年第2期)

数字化赋能高校虚拟教研建设:国际启示与本土策略 | 胡小勇 许课雪 刘雪旒 等

摘要: 作为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教育数字化为我国高校教研创新注入了新动能。数字化赋能的高校虚拟教研日益受到关注,但仍处于发展方向有待明晰的萌发探索阶段。研究探究了高校虚拟教研类型及共性特征,明确了各类教研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典型问题:专业建设与社会发展脱节、课程建设应用性不足,以及课堂质量亟待提升;系统梳理了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教研建设的国际政策及其着力焦点,剖析了政策启示与案例经验,进而提出推动高校专业建设与新质人才培养融合、倡导校际课程协同数智

共建共享、提升教学数字化创新应用水平等以数字化赋能高校虚拟教研深入发展的推进策略。

关键词：高校教研；虚拟教研；教育数字化；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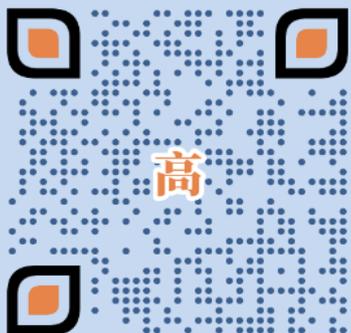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学发展的理念与实践探析 | 李辉 刘苗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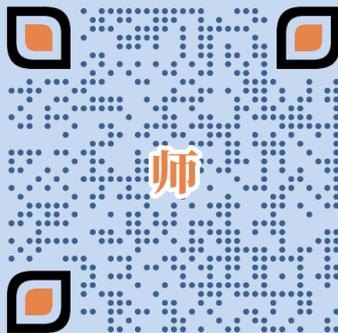
摘要：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在教育教学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离不开其独特的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发展理念。大学的价值观、大学教学理念的原则以及大学研究和教学的道德原则等均体现了赫尔辛基大学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发展理念。为落实教学发展理念，赫尔辛基大学关注与激励教师的教学能力发展，重视发挥学生参与和反馈的作用，实施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促进教学发展。借鉴其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本研究认为应从多维度精准助推教师教学发展，坚持以教学发展来服务于学生主体，营造优秀的教学文化、鼓励教师的教学学术发展，构建教师分类聘任制度、重视教学评价，开展评估调查和获取反馈、加强教学质量等方面来推进我国大学的教学发展。

关键词：赫尔辛基大学；教学发展；教学学术；教学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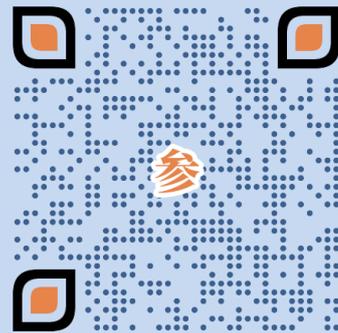
（《教育科学》2024年第5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师教育专题信息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年第11期
第2卷第11期·总第22期
2025年5月15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100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2楼
<https://ghc.shnu.edu.cn>